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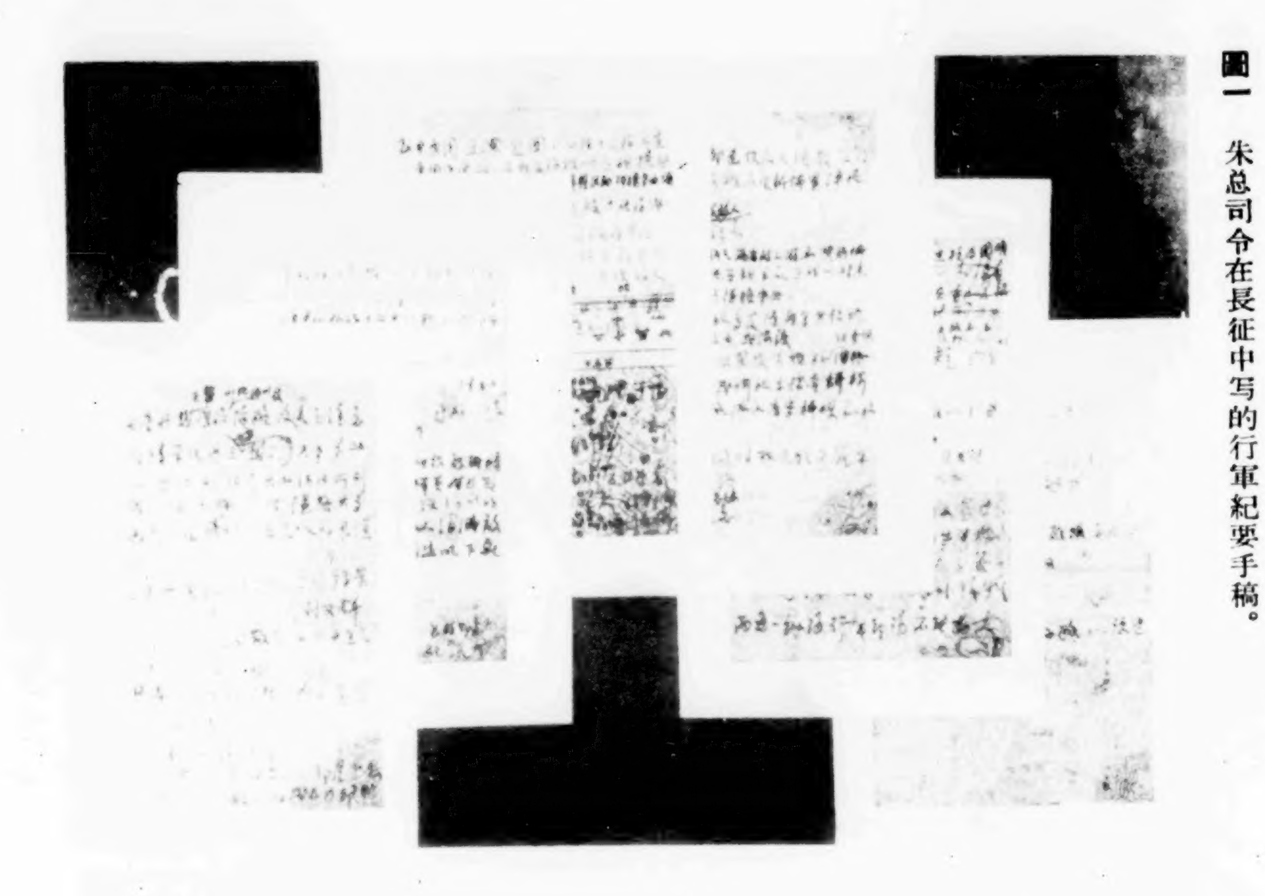
LISHI JIAOXUE

11

1958



中国現代史参考图片（四）



圖一 朱总司令在長征中写的行軍紀要手稿。

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佈告

紅軍是工農[illegible]的軍隊，實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illegible]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消滅豪紳地主封建勢力，
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illegible]一切特權，驅逐帝國
主義出中國，為創造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蘇維埃而奮鬥！
紅軍所到之地，絕對保護工農貧民的利益，對工人主張實行八
小時工作制，增加工錢，對農民主張不交租，不納稅，不完債，沒收
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對少數民族，主張民族自決，民
族平等。[illegible]與工農同等待遇，反對漢族的地主[illegible]的壓迫，
對於白軍士兵，歡迎他們拖槍來當紅軍，參加工農的革命，對於
城市鄉鎮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其自由營業。
紅軍是有嚴格紀律的軍隊，不拿群眾一點東西，借群眾
的東西要送還，買賣按照市價，如有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
，每個群眾都可到政治部來控告。
凡我工農群眾，切勿聽信豪紳地主的欺騙，各宜安居樂
業，並大家一齊來實行共產黨的主張，自動打土豪分田地，
實行八小時工作，繳械一切反動武裝，來武裝工農，建立蘇
維埃政權，[illegible]，並歡迎工農群眾報名當紅軍，
幫助紅軍運輸，[illegible]工農群眾的[illegible]解放。如有破
壞紅軍及[illegible]給反革命派的偵探，進行反革命活
動的份子，[illegible]嚴行處罰。此佈

代主任李富春

公曆一九三五年一月 日

圖二 中国工农紅軍总政治部在長征中发出的布告。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

（总第95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河北省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新華书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26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78元

半年六期　1.56元

全年十二期　3.12元

本期印数001—24,230

六亿神州尽舜尧*

孙定国

毛澤东同志最近所写的"送瘟神"詩篇中，有一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絕好的詩句。我訊为这一句詩不但是对于居住在神州这块土地上的六亿人民在1958年各方面所創造的新生活最好的概括，而且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創造历史的理論在当前这个时代的頂峯上的一个最富有詩意、最富有哲学思想的天才概括。

数千年来，堯舜这两个人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圣人中的圣人，英雄中的英雄，所謂"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是也。这不但在尚书的堯典和舜典中，对于这两位圣人作了古典式的描写和高度的贊揚，一日放勛，一日重华，尽是褒詞，毫无貶意；而且在后来的諸子百家中也很少看到对这两位圣人有什么苛責，至圣孔子，亚圣孟子，緬怀往古，追念伊人，也总是把唐虞盛世，当作最高理想。这是儒家重要传統思想之一。我們在这里且不管儒家特别是后来的一些道学先生們之这样做，在維护封建統治上起了何种反动作用，同时也不要管在历史上的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們，借唐堯虞舜来遂行他們的託古改制的宣传起了何种进步作用。但是堯舜这两个人物，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而且就是因为这样使他們成了圣人中的圣人，英雄中的英雄。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論勉人或自勉，总是以这两位圣人作为最高标准的。孔丘說"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之，"言必称堯舜"。孟軻說："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且还說"人皆可以为堯舜。"这是最足以說明这个思想的。但是，話是这样說的，事情却不是这样作的。在長期的阶級社会中，又有誰是真正承認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能够和堯舜并称呢？能够以"下愚"与"上智"媲美呢？就是孟軻，还不是因为他自認为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誰，正是为了說明自已的高明和了不得才宣传"人皆可以为堯舜"的嗎？韓愈在"原道"一文中，論到历史上的道統真传，数来数去，从远唐到近唐，还不只是数出九个人来嗎？而这九个人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而且他还說"軻之死不得其传焉"，如果是象韓愈自己所設想的那样，継孟軻的就是他自己，那也不过是九加一，十个人而已。这就說明"人皆可以为堯舜"是一个真理，而又是一句空話。把这句空話变成实話，把这个真理变成"实践"，在阶級社会里，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在共产党所領导的真正解放了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才有可能。因此，"六亿神州尽舜堯"这句話在实質上是几千年前"人皆可以为堯舜"这句話的彻底的实現，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群众創造历史的理論的深刻的表現，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偉大現实，同时也就是毛澤东同志的最彻底的最深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綫的思想的最卓越的說明。

"六亿神州尽舜堯"，这就是說中国的六亿人民都是舜堯，都是圣人，都是英雄。六亿人民是一个圣人和英雄的集体，同时也就是一个集体的圣人和英雄。

可是，今之堯舜却远非古之堯舜所可比。古之堯舜是原始的，而今之堯舜是社会主义的；古之堯舜是蒙昧初始的圣人和英雄，而今之堯舜却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的創造者和开辟者。因此，先圣后圣其名則一，其揆則二。

我認为，我們必須提高到这样高度的水平上来認識这个問題，才能了解毛澤东同志这句詩的深刻意义，才能够了解毛澤东同志用这句詩来概括1958年我国生活的偉大意义。

---

*孙定国同志在本刊1958年二、三、四期上發表的"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最近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文是作者为这本书寫的一篇代序。經征得作者同意，特先在本刊發表。为適合刊物發表的需要，我們对文章作了一些删改。 ——編者

我們曾經說过，1958年将是一个更偉大的丰收年，而事实正是如此。尽管今年还有两个月零二十几天的时間，但是从我們現在各个战綫上所已經取得的成績看来，今年这一年比1957年是更大得不可比拟的丰收年是完全肯定了的。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議的报告中，曾指出1958年的春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論工业、农业和其它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

在这个报告中已經科学地总結了今年一月到四月間我国工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情况。

而在八大二次会議以后，我国生活在各方面的飞速的发展更是惊人的。八月間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又进一步作了分析和总結，并提出今年的宏偉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而奋斗，并加速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就使着全国人民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照耀下，更进一步地創造着各个战綫上的光輝的奇迹。

粮食元帅，一馬当前首先升帳，成为1958年我国生产全面跃进的重大特点之一。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这不但是我国农业生产史上的奇迹，而且是全世界农业生产史上的奇迹。夏季粮食1957年为597亿斤，1958年为1,010亿斤，其中冬小麦1957年为410亿斤，1958年为689亿斤。春麦1957年为60亿斤，1958年为100亿斤。早稻1957年为387亿斤，1958年为870亿斤。中稻1957年为809亿斤，1958年为1,130亿斤。这样总計1957年为1,835亿斤，1958年为3,060亿斤，共增产为1,225亿斤。这个統計数字是根据1958年已收获和正在收获粮食作物的8.7亿亩的播种面积計算的，这个播种面积約占全年粮食面积百分之四十七左右，而产量却已达到了3,060亿斤，已相当于1957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这个增产数比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五年累計增产的612亿斤还超过了百分之八十八。这是多么巨大的跃进啊！这个跃进，引起六亿人民的欢呼，实际产量使那些观潮派和秋后算賬派不得不甘心服輸。而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不在这跃进面前胆战心惊起来，尽管他們还竭力貶低这一粮食增产的重大意义而造謠說謊，但也不得不承认矗立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位粮食元帅对于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得不可比拟的打击力量。

当然在这里我們还不能不提到主要农作物的高額丰产"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元帅"单位的情况。

在高額丰产"卫星"田方面表示如下：

作　物	省县别	单　　位	亩数	亩产(斤)
冬小麦	河南西平	和平社四队	2.000	7,320
春小麦	青　　海	賽什克农場	1.059	8,585
大　麦	山西介休	联福社六队	1.045	5,702
早　稻	湖北麻城	建国一社	1.016	36,956
中　稻	广西环江	紅旗人民公社	1.075	130,434
玉　米	河南睢县	紅光人民公社	1.020	28,696
高　粱	河北威县	常屯卫星人民公社	1.300	15,833
大　豆	山东莒县	爱国公社二大队十一生产队	1.000	11,700
各油菜籽	湖北麻城	燎原一社	1.790	1,310
花　生	湖北紅安	永江人民公社	1.058	35,423
芝　蔴	湖北襄阳	小樊乡	10.000	3,000+

在主要作物大面积丰产元帅单位方面表示如下：

作　物	省　别	县　别	面积(万亩)	亩产(斤)
冬小麦	湖　北	谷　城	24.0	600
	河　南	孟　县	25.8	600
春小麦	甘　肃	敦　煌	6.6	1,037
早　稻	河　南	新　县	5.7	2,000
中　稻	湖　北	监　利	33.0	2,316
玉　米	山　东	寿　張	1.4	5,030
谷　子	山　东	寿　張	5.2	5,151

讀者試一讀大家非常熟习的列表中的数字，这会怎样地加强我們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呀！中国五亿农民有多么偉大的創造力呀！他們不仅放出了从人类有史以来所未曾見过而且也是未曾預料过的高額丰产的卫星，而且也还創造了和培养出来举世震惊的大面积丰产元帅来。同时这样的卫星要越放越高，这样的元帅的令箭也要越来越指向四面八方。就是这样，我国的小麦和棉花的总产量，已經肯定地超过美帝国主义了，而这个超过，就将使帝国主义永远再也跟不上而且要把它抛得更远。而現在全国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为明年即为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作准备，正在貫徹着北戴河会議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据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北等十个省市已經深翻土地二亿二

千多万亩，陕西等四省完成秋收任务一半以上，北京郊区完成种麦。大家試想想看，这种深耕运动的全面完成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于明年的更大的丰收不是又打下了絕对可靠的基础了嗎？

当然在談到农业丰收的时候，不能不着重地提一下我国水利建設問題。1958年之所以完成这样的偉大丰收是和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設的成功分不开的，就是說在我們国家里，由于农民的艰苦劳动，由于水利建設的日益发展，靠天吃飯的思想一变而为不靠天吃飯的思想，这就提供了連年丰收的重大保証。在这里只要举出天津专区和徐水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徐水人民完成了瀑河水庫的建筑工作，瀑河也就再不能为暴了。变暴河为馴河，这对于徐水人民在生产上的大翻身起了重大作用。天津专区由于改造洼地成功，这就变水害为水利，变灾区为富区，洼地改造的成功，对于天津专区人民在生产上的大翻身也同样地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在这一方面的偉大創造，使历史上的三过家門而不入的治水的大禹和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眞正不能不感到后来者居上了。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曾指出："去冬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設，在今年防汛抗旱斗爭中，发揮了巨大作用，縮小了成灾面积，减輕了灾害程度，减少了粮食損失約三百亿斤到四百亿斤，开始創造了农业生产能够基本上避免一般水旱灾害的可能，使农业生产能够比較穩定的发展。"中国人民不論是在深耕和改良土壤方面还是在水利工作方面都創造了一系列的史无前例的經驗，这些經驗在中央的指示中都作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結。这些經驗造福于我国人民以至于造福整个人类，都将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六亿神州尽舜堯"，首先不能不考虑到我們五亿农民，他們不愧为眞正的英雄，他們在1958年使粮食元帅威风凛凛地升了帳，創造了我国史无前例的光輝业蹟，从而又推动了我国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

由于农业的大跃进，同时也就引起了工业的大跃进，粮食元帅升帳了，鋼鉄元帅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升帳。現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全民炼鋼的口号所鼓舞而齐心协力地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而斗爭。現在看起来，这个巨大的任务，中国人民是有把握把它彻底完成了的。

我們特别高兴地看到了10月12日人民日报关于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的現場会議促进用土鉄炼鋼的消息和用土鉄炼好鋼的社論。因为这个消息給我們提供了在今年彻底完成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絕对保証。

全国人民为了使鋼鉄元帅迅速升帳，在各省、市日日夜夜有几千万群众紧張而热烈地投入全民炼鉄运动。鉄的生产量在近几个月来是在飞跃地前进着。根据9月29日的統計，在我国已經出現了日产万吨以上的九个卫星省，这就是：遼宁，22,295吨，河南，90,784吨，河北，58,300吨，山西，25,700吨，湖北，16,912吨，湖南，15,517吨，山东，67,390吨（其中包括二类鉄53,808吨），四川，10,200吨，江苏，14,924吨（其中包括燒結鉄4,851吨）。而貴州省又提前三个月超額完成了2,546吨的全年炼鉄計划。这就說明了从9月份以来全国生鉄的产量是扶搖直上的，給炼鋼的生鉄原料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础，基本上扭轉了生鉄不足的情况。可是在这里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利用土鉄炼鋼的技术問題沒有解决，因此鋼的产量跟不上鉄的产量速度快。令人兴奋的是天津新兴鋼厂的工人和冶金工业部的技术組一起以頑强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土鉄里的有害杂質——硫、磷作斗爭，終于用土鉄炼出好鋼来了。这是一个喜訊。它将迅速而有效地充分使用千万群众所創造的土鉄使之变成好鋼，使鋼产量与鉄产量同时飞跃前进，保証我們彻底地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巨大任务。这个經驗一經被广泛地运用起来，可以断定，鋼鉄战綫上的新卫星一定要发射出震惊全世界的光芒。

我国的其它工业产品也同样在迅速地发展着。单就煤炭一項，九月份，全国原煤产量达到了23,864,000吨，已超过英国月产水平，平均日产量795,400吨，十月上旬平均日产量則达到88万多吨。河南省宝丰县創造了日产30,000多吨的卫星；唐家庄矿5299工作面9月份采煤62,000多吨，比六月份創造的世界新紀录又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八点七九；而10月14日广西忻城仅十九个小时竟产到67万多吨。讀者試想想看，中国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在工业战綫上的創造力有着何等不可估量的巨大潛力啊！

随着工农业的新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方面在1958年有了巨大的发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运动，正在我国蓬勃发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不論是在工业或农业方面，都在日新月异地放出异彩。1956年所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規划，总的說可以提前五年完成，有相当的一部分可以提前七年完成。强化高爐的冶炼过程已經突破規划并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子显微鏡等重要光学仪器的制造已經成功。更为重要的是由苏联帮助我們建成的原子反应堆和廻旋加速器已被交工生产，原子科学的研究也要通过群众路綫来进行，这就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打破对于尖端科学的神秘感，而使我們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更迅速地走上世界的前列。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重大发展，还表現在科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方針的逐漸为广大人民所掌握。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学习文化学习科学、发展文化发展科学的热潮形成一种勃发而不可挡之势，即以工人农民学哲学来說，不論是从广度和深度看来都是史无前例的，自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哲学、河南三官庙农民学哲学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公布之后，工人农民学哲学的浪潮，立刻席捲全国，工

人农民要自觉地起来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显然对于建設社会主义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是一件大事。关于工人农民写詩、画画、作文章的风气之盛，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切都标志着劳动者日益掌握起文化和科学的工具，日益知識分子化起来，体力劳动者同时也是脑力劳动者。而另一方面，广大知識分子紛紛下乡下厂，直接参加体力劳动来得在生产的实践中学习生产技术，經受劳动鍛煉，使知識分子日益工农化起来，脑力劳动者同时也是体力劳动者。在我国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要逐漸縮小起来并逐漸走上消灭。而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广大青年中間，广泛地采取勤工儉学以及半工半讀的办法，因此，新中国的后一代正在沿着又专又紅的道路前进，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的青年和少年一代，将不知道什么知識分子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存在的事，也不知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家是怎样一回事了。成千上万的在农村公社里，在工厂企业里，在大专学校中的紅专大学以及半工半讀学校，正在为完成这一光輝任务而起着重大作用。

除四害的全民运动在1958年也呈現着大跃进的形势。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継續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将近一年来，全国工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老鼠、麻雀、蚊子、蒼蝇这四害在許多地方已經基本消灭，講卫生在許多地方已經成为广大人民的习慣，許多危害最严重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大大减低了，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已經有了很显著的成效。除四害講卫生确实表现出"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偉大作用"。除四害这一件事是我国的偉大創举，我国人民把人們認为不可能消灭淨尽的老鼠、麻雀、蚊子、蒼蝇之类的东西，要把它們消灭淨尽，要叫它們离开地球，"毋俾遺育于茲土"。这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堅强意志和偉大气魄。难道作为人，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度文明的人，能让这些小小的吃人的血肉的虫豸，肆无忌憚嗎？作为人而竟然長期地受这些虫豸欺負，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毛澤东同志在"送瘟神"一詩中所表現出的偉大气魄和远大的理想也正就是中国人民長期的理想。

我們在体育方面的飞跃前进的形势也必須着重地写一笔。長期被帝国主义者无耻地嘲笑为东亚病夫的我国，现在从体育方面来看我們也是百炼成鋼的历史巨人。毛澤东同志号召我国要有六亿人民参加游泳，多么偉大的号召啊！誰謂河广？誰謂江深？中国人民将以"一葦航之"的精神，把它們变成天然的游泳池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贏体脑双健，智育体育一齐发展起来。

多么偉大的1958年啊！1958年中国人民在各个战綫上放出了多少惊人的"卫星"啊！随着这些"卫星"的放出人們又怎样能不承認"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个眞理呢？不是堯舜，不是圣人，不是英雄，不是集体的圣人和英雄，英雄和圣人的集体，又誰个能使我們的国家造成这全面大跃进的新的形势呢？可是在这个全面大跃进的形势里，还有一顆最大的"卫星"，由于这顆"卫星"的飞上天空，就使着我国造成一种比1958年更大的更全面的跃进的新形势。这个大"卫星"的名字就是人民公社。一方面由于我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方面又由于全国人民共产主义覺悟的更广泛更迅速的提高，在我国，在六亿人口的国家里，在今年七月間开始了蓬蓬勃勃的人民公社化的运动。这个运动突出的特点是来势猛、声势大，发展健康群众满意，"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要过好日子，更上一层楼"已經迅速地成为全国人民普遍心愿和一致的行动。运动从七月开始，八月普遍规划、試办，九月份即进入全面高潮，而这个高潮时期前后仅仅一个月时間，到九月底在全国范围内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二个省、市区百分之百的农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市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农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現公社化；而在十月才完成的只是极少数的省份。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飞快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运动的速度都是更为飞快的，甚至比起1955年冬季的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都是要飞快得多。

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是中国人民在1958年放出的一切"卫星"中的最大的一顆。这是一顆光芒万丈光芒几万丈的大"卫星"，它更进一步照亮了六亿人民的心。这顆"卫星"将要带动着工业战綫上、农业战綫上以及科学文化战綫上一切新的"卫星"飞上更高的天空。它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形式。中国人民将通过这个形式全面地組織工农商学兵的力量，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設，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形式为共产主义积极地創造条件，并找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徑。共产主义社会在我国已經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了。1958年将以极大的光輝写入中国史篇，而为我們子孙世代永远誦念不忘。

根据以上分析，我們就不难看出，毛澤东同志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偉大詩句，正是中国人民进入这个嶄新的偉大的时期的正确反映。試問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是六亿神州都是堯舜式的人物，又怎样創造了这样偉大的奇迹呢？事在人为，而这些也

就是尧舜式的圣人，尧舜式的英雄。“英雄造时势”，“圣人开未来”，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才造成了1958年这样偉大的現实，并开辟着我們的远大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未來。

現在要問，为什么1957年是一个偉大的丰收年？1958年又是一个更大的丰收年？在我們国家里，为什么一个丰收緊跟着一个大丰收？一个大跃进又緊跟着一个大大跃进呢？要回答这个問題，应該是很簡单的，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領导的結果，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照亮了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的結果。这条总路綫，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議的报告中指出它的基本要点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級专政和无产阶級的国际团結；在継續完成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領导、全面規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同志所概括的总路綫的这些要点，我們通过我国近几年的生活特别是經过1956年到1958年的生活，已經深刻地体会到为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制訂的彻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是中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并引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指路明灯。只要在实际工作中堅持这条总路綫就要取得胜利；相反，只要稍为违背这条总路綫就要使我們的事业遭受損失。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作了一个极其概括但又是极其深刻的历史分析：“一个馬鞍形，两头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綫上所表現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是的，正是如此，我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是由于这个馬鞍形的教訓，而更加深刻地自觉地来掌握党的总路綫精神和实質，更加一致地团結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了。因此，“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从一方面看来，毛澤东同志主要是在歌頌中国人民創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創造力量和他們的崇高至上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亿神州之所以尽是舜尧，他們之所以能够发揮巨大的創造力量和培养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恰恰又是党的总路綫的胜利，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胜利。毛澤东同志从領导我們进行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始終高度地信任着中国人民的宏大无比的創造力量。中国人民在党領导之下革了帝国主义的命，革了封建制度的命，革了官僚资产阶級蔣介石集团的命，革了資本主义制度的命。作为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要求高速度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建立自己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記帝国主义長期对我們的侵略和压迫，不会忘記蔣介石集团所給予我們的痛苦和灾难，不会忘記封建制度曾長期地束縛着中国的生产力不能迅速地得到发展的落后狀态，更不会忘記为打倒这些敌人和取消这些落后的东西，中国人民經过一百多年特别是三十年来的流血斗爭曾經支付了多么高貴的代价。我們只有一点点鋼，我們没有多少粮食，我們穷得很，我們缺少文化，科学落后，我們必須六亿人民一齐动手来改变这种狀态。我們应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应該多而且快，好而且省，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孙飞跃地前进，走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幸福的天堂。这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表現。毛澤东同志正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銳利武器，正确地反映了概括了科学化了人民的这种愿望、要求、思想感情和共产主义精神，把它变成党的行动綱領、党的总路綫，因而党的总路綫，也就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偉大动力了。这个动力是人民的动力，是六亿人民的动力，是在又穷又白的穷困和落后的条件下的六亿人民的动力，这个动力已經发动起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想要慢步前进，也是不可能的。党的总路綫的力量的源泉就是在于这里。因之“六亿神州尽舜尧”，正是六亿人民的創造力量和党的总路綫交織在一起的結果。毛澤东同志在他著名的介紹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深刻地分析了这一問題，他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資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長的时間了。除了党的領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見人民群众象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除了別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没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澤东同志的这一段話，值得我們反覆地深入思考，它揭示了党的总路綫的客观基础，揭示了解放了的六亿人民的精神世界，揭示了党的領导和六亿人民的深刻关系。只有深刻地懂得了这些，这才能够了解我国近年来特别是1958年这个巨大跃进的眞正原因。

毛澤东同志进一步闡明了和发揮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論，对于引导全国人民以不断革命

的精神来貫彻党的总路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坚决主張不断革命論者，毛澤东同志継承了、坚持了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論而結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又大大地把它向前推进了。毛澤东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加以区别而又把它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不断的、不停顿的，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設和共产主义建設，同样也加以区别而又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这个区别和联系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也把它看作是不断的、不停顿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澤东同志又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大的革命阶段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革命也把它看作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的、不停顿的。例如在民主革命阶段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抗日战爭；解放战爭，是一个革命跟着一个革命，而且在这每一阶段中，也同样是一个革命跟着一个革命。又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１９４９年在全国范围內取得政权开始，接着就在新解放区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完成了，就立即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而紧接着就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完成了生产资料占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１９５７年又紧接着进行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取得胜利了，１９５８年紧接着又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口号。在我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在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大革命运动，因而使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各个战綫上的奇迹，日新月异地展示在全国和世界的人民面前了。由于革命是不断的、不停顿的，因而人民的智慧、干劲、創造力的发展也是不断的、不停顿的。革命是一波跟着一波，一浪推着一浪，因而人民的智慧、干劲和創造力，也是一月、一天、一小时甚至于每一分、每一秒鐘都会有新的发展和新的提高。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以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精神，向大自然界开战，向天夺权，征服人們認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創造人們認为所不能創造的奇迹，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就是由于毛澤东同志的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論，通过人民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而日益深入人心了。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从自己切身經驗体会到，只有革命是不断的、不停顿的，才能够把革命的敌人一个又一个打落下去，而排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也只有革命是不断的、不停顿的，才能够把社会主义的財富越积累越多，也就是粮食越来越多，鋼鉄越来越多，才能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富强繁荣的国家。不断革命是不断地消灭剝削消灭貧困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創造幸福創造文明的源泉。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毛澤东同志的不断革命的理論是这样广泛地深刻地被六亿人民所掌握，才能够理解１９５８年在我們国家里为什么发生了象这样翻天复地的变化，才能够理解到六亿人民为什么在貫彻党的总路綫时有那样"天不怕，地不怕，遇到老虎打三架"的冲天的干劲。

毛澤东同志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說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的教导，对于造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偉大局面的偉大促进作用，也是我們估計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必須加以切实注意的一个重要問題。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科学文化大跃进，是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跃进分不开的，应該說没有思想的大跃进，一切其它方面的大跃进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的大轉变时期都有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十六世紀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級革命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义誕生了，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思想大解放。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的风暴。思想解放和历史变革、革命的发展总是成正比的。毛澤东同志領导中国革命历来都是主張解放思想的，而在近几年来又特別着重地强調了这一問題，这也是和中国历史行程的新发展分不开的。毛澤东同志看到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問題解决了，1957年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革命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如果再进一步号召人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再进一步批評各种迷信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去掉貫桂奴态，而使六亿人民眞正树立起敢說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就一定会使中国人民更好地掌握当前的现实，并开辟着偉大的未来。而事实正是如此。讀者試想想看，在这个偉大的1958年中，中国人民已經破除了多少長期束縛着自己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迷信呀！多少陈規陋习，多少淸規戒律，多少陈旧公式，多少冒牌"权威"，都通过中国人民偉大的实践而把它們一个一个地破除了，抛掉了。而我們的讀者更清楚地知道只有破除了这种种迷信，抛掉了种种偶象，才使得人們的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前所未有的跃进。应該指出，毛澤东同志所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名言，是推动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下，不論在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多少被人們看作卑賤的人們成了眞正的专家、眞正的发明創造家啊！多少被某些自命为尊貴的人物所看不起的卑賤人物以惊人的創造能力而勇敢地敲开了科学的大門成为出色的紧密联系实践、联系人民的科学家啊！在这些优秀人物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天見之于报章杂志的新人物，眞是叫人数也数不清的。有61岁的曹依秀，有21岁的蔣少芳，有治蚊专家李始美，有深翻土地的首創者馬同义，还有士兵哲学家向胜昌………，这些人的名字是数不清、写不完的。陈伯达同志把这些优秀人物叫做是毛澤东式的

人物，这是十分正确的。所以要把他們叫做毛澤东式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們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勇于追求眞理的人，是为了追求眞理而当仁不計的人，是敢說敢想敢干而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当然，談到共产主义风格，就更有必要注意到在我們国家中，随着生产的大跃进，随着人民公社的大发展，人們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普遍地广泛地提高起来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把自已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又紅又专的新人”，已經成为广大人民的行动指針了。列宁同志曾把义务劳动星期六称之为共产主义的萌芽，而在我國的义务劳动显然已經不是什么星期六的問題了。举世聞名的十三陵水庫，就是首都的广大軍民的义务劳动修成的，全国聞名的瀑河水庫也是徐水人民的义务劳动修成的，天津人民正在和海河搏斗，他們也完全是义务劳动。义务劳动的风气遍于全中国。工人自动提出取消計件工資，作家主动要求降低以至取消稿費，“我們的劳动不是为了鈔票，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口号也响遍全中国，誰都清楚，这种无偿劳动的风尙，就是共产主义的风尙，这不能不說是中国人民正經历着再一次的思想大革命。这个斗爭将进一步地破坏着資产阶級法权观念，这就不能不为我們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創造着有利的条件。随着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到处林立，这不仅使中国妇女眞正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随着这些共产主义萌芽的成長和发展，在几千年以前我們的先人所憧憬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美妙社会，已經逐漸地成为現实了。由于党的亦工亦农、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政策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功，亦将逐漸創造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有利条件。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在1958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而正是为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党的总路綫会貫彻得这样好，同时也可以看得出，在貫彻党的总路綫的过程中毛澤东同志長期对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教育起了何等重大的作用。我們要深刻了解“六亿神州尽舜堯”这句詩的深刻涵意，我認为还必須从这一方面多想一想。

关于党的群众路綫的領导方法，在新时期的巨大发展，对于貫彻党的总路綫，对于高度地发揮群众的創造力量，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領导方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們曾作过比較詳細的分析。但为了适应新的生产高潮、新的大跃进的形势的到来，在近年来党的領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中央到地方党委都作了重大的改变，党的群众路綫的領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表現在各种并举和各种結合的方法，更有利于全面地发揮全党全民的积极性。我們的一切事业都注意到通过全民来办理，农业是全民的，工业是全民的，教育文化事业是全民的，以至于原子科学的发展也是全民的。这种高度地发揮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是高度地发揮了全民的积极性，当然在这里就更有利于貫彻民主集中的原則。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更有利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由于全民軍事化，民主的程度加强了，扩大了，組織性和紀律性也随之而加强了，提高了。檢查、評比、展覽、参观竞賽的方法，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新的发展。檢查是按月按季逐級来进行的，这种檢查，对于各种工作跃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群众性的評比、群众性的展覽和群众性的参观的人数是以百計、千計、万計甚至在万計以上。例如上海、天津等地在工业方面和新的发明創造方面的群众性的比武大会，参观的人数是以十万計百万計的，通过这些形式使各地区、各省市、各个行业互相比較、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互相滲透和互相推动。这对于拔白旗插紅旗，对于社会主义的竞賽和协作，其作用也是很难估量的。在展覽和評比方面，不仅要比經济比技术，而且还要比政治比領导艺术等，这在領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充满着嶄新的內容。正确地解决紅与专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政治与經济、技术的关系等等，并特别强調政治挂帅、虚实并举等方法，以及关于普遍和試驗田、抓两头带中間等方法，都在日益充实着新的內容，日益表現着新的力量。这一切对于貫彻党的总路綫和发揮群众的創造力量都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应該說明，中国人民，正在經历着恩格斯所說的——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的偉大时代。在这个偉大的时代里，偉大的中国人民是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自觉性的。这种自觉性是党的教导的結果，是毛澤东同志長期教育的結果。当然，我們并不是說，“六亿神州尽舜堯”就等于說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先进的，都是彻底革命的完美无缺的，我們的工作就没有缺点了，在我們国家里并不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斗爭了，那当然不是的，因为那样也就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辯証法了。相反，我們是就其总体来說，就其先进与落后斗爭的結果来說，我們的人民是先进的，我們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堯舜式的人民。如果不是这样，我們就无法創造出偉大的1958年。

敬爱的历史学家們，你們将如何具体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創造历史的理論来写中国的历史，来写偉大的1958年，人民在期待着你們！

1958.10.15.

教学参考

关于中国古代中世史封建社会部分的分期分段問題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史教研組

一

在前一阶段的教学改革运动中，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史教学工作中的“厚古薄今”、“厚帝王将相薄劳动人民”等資产阶級学术观念和历史观点，遭到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中国古代中世史教学工作的这一根本性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任課教师的資产阶級立場、观点和方法造成的。但也应当承認，具有指导意义的旧的中国古代中世史教学大綱，跟这个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师生在共同編制新的中国古代中世史教学大綱的同时，对旧的教学大綱也进行了檢査和討論，以便由此取得經驗教訓，找出正确的方向和途徑。

大家知道，社会历史是物質資料生产方式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不闡述历史的这一客观过程就必然陷于唯心主义的泥坑，抹杀历史发展的規律，歪曲历史的眞实面貌。旧大綱虽然是按照原始公社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变更而編制的，但从根本上看，它仍然陷于王朝体系，形成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它的許多編是按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等朝代編成的，这跟旧大学的断代史的断限并无区别。而且大綱的篇章节目一再地把王朝盛衰列为标题，如“周人起于黄土高原”，“宗周灭亡”，“西汉的建立”，“东汉的建立”，“三国分立”，“吳的灭亡”，“蜀的灭亡”，“西晋的建立”，“西晋的灭亡”，“唐帝国的建立”，“唐朝的灭亡”，“北宋的建立”，“北宋的灭亡”……，几乎历史上所有朝代的建立和灭亡，都得以在大綱上反映出来。这样大量的事实，不能不使大綱形成为王朝盛衰历史的傾向。这使未被彻底改造过来的和存在着旧的資产阶級唯心史观的教师易于按照旧观点講述历史。为什么对王朝的盛衰这样关心？它跟旧的史书区别在哪里？按照王朝盛衰来講述历史，跟过去“天下之兴也久矣……一治一乱”、“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究竟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很显然，这个以王朝为中心的体系，跟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完全不相容的。

1934年联共（布）中央对苏联各学校的历史教学有过这一重要的指示，即：“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講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必須牢固的記忆着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这是学生們能够切实領悟历史課程之决定的条件。……”（“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解放社版，第340頁。）这个指示对于我們的历史教学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朝代的更换，是几千年历史的一个存在。利用这些朝代，作为講述历史事件的前后順序，是有其方便之处的。批判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体系，絕不是說，在今后历史教学中不許提出朝代，这是必須加以区别的。既然朝代是被利用来作为历史事件前后順序的符号，因此在編制新大綱时，没有必要按照世紀分篇分章，否則就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这是一点。

其次，每一个王朝的建立和灭亡几乎都在旧大綱中标出，这也是錯誤的。例如，黄巢大起义之后，唐皇室局促于关中一隅，全国已經处于分裂割据的狀态中，“唐朝的灭亡”根本没有必要在大綱中标出。封建主义的史籍所以要把唐朝灭亡記述下来，就是为朱溫的梁朝取得“正統”合法的地位。旧大綱一一标出

朝代的兴亡，不能不是王朝正統观念的一个反映。这是应当加以指責的。但是，批判王朝正統观念，絕不是說，任何王朝的建立和灭亡一律不得在大綱上反映。有些王朝的建立和灭亡，足以显示社会經济的变革和阶級斗爭的一些表征，或者对基础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可以作为社会阶段分期的界标，仍然要在大綱上标示出来。这也是应該加以区别的。

大家知道，社会历史是物質資料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毛主席教导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31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基本原理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柱石。我們的旧教学大綱在这一点上是不够鮮明的，而表現于以帝王将相作为叙述的中心。单是在西周一章中，就有如下的一些标目，如所謂：“后稷公刘和农业”，“公亶父‘始創王业’”，“文王东向經营”，“武王伐紂”，“周公东征”，“周公对于商遺民的处置”等。把这些标題中的名字联貫起来，从周的先公先王到文武周公，构成了頗称完备的周初以前的帝王家譜。

旧教学大綱不仅尽力罗列了帝王将相的活动，而且也竭力夸大了帝王相将的作用。以秦始皇为例，既有“秦王政兼并六国”，又有“秦始皇巡游郡县”。看来“祭祀名山大川”和“刻石”的标目，也都为秦始皇而設立的。甚至连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阿房宮等极度奢侈的修建，也冠上了这类詞句——“象征統一和集权的巨大建筑物”而予以肯定下来！对帝王将相作用的夸大是不一而足的。有的帝王是被看作某些重要制度的創造者，如“曹操在許昌施行屯田”，便把經黃巾大起义而延續的一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看作为由曹操等某些个人創立的。有的帝王被看作为农民的保护者，如在“明初政治和經济”一章中，有所謂“对小自耕农的扶持”，就足以說明。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給这种作用以最正确的估价。列宁說：“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9頁）但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決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旧大綱既然以帝王将相的活动摆在首要地位，这就大大減少了劳动人民的活动的篇幅，并使劳动人民居于陪衬的地位。旧大綱过分夸大了帝王将相的作用，这就大大貶低了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的眞正作用。虽然旧大綱也标出了許多次的农民战爭，但仅是在这样場合下劳动人民才出現，而在政治制度經济制度的标目中，全然看不出这些制度中所反映的阶級斗爭，根本不可能表达阶級斗爭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恰恰相反，帝王将相成了决定历史命运、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旧教学大綱存在的問題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但上述問題则是旧教学大綱中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說王朝体系是它的表現形式，那就应当說，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中心，乃是它的实質所在。这两者是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使用这样一个教学大綱来貫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厚今薄古”、把历史为今服务的方針，是南轅北轍的。

党指示給我們：必須改变中国古代中世史的教学面貌，把历史講解为人民群众的历史，講解为阶級斗爭的历史。为了使新編中国古代中世史教学大綱插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紅旗，打破旧大綱的王朝盛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体系，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了。只有大破，才能大立。但是，怎样在新教学大綱中糾正这个严重的缺陷？我們認为：必須按照物質資料生产方式变更的普遍規律来观察中国古代中世史的发展变化，特别对于長期延續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期分段，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分期分段問題是一个煩难复杂的問題，必須得到广泛的协作，才能完成。为此，我們就把这个問題提供出来，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指正。

二

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的学說，遵循毛主席的“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发展的眞正动力”（“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19頁。）这一指示，同时吸取苏联史学家有关历史分期問題的意見，中国古代中世史教研組同志們一致主張以农民的阶級斗爭的发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內部分期的最重要的标准。即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年黃巾大起义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大段；自黃巾大起义失敗到黃巢大起义是第二大段（184年——884年）；自黃巢大起义失敗到鴉片战爭前是第三大段（884——1840）。这个划分是以各个阶段的阶級斗爭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特征——这种特征是以反映各阶段全部經济政治的面貌——作为依据的。由于篇幅的关系，下面簡单地叙述一下这三大段的主要狀況。

第一大段。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公社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現，从而促进了封建經济关系

的发生和发展。在这种經济关系制約下，新兴地主阶級的力量日益成長起来。相应着經济基础的这一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国时期最先发軔于魏，継而在楚、秦等国所实行的变法，便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物的具体活动，从而使封建經济制度确立下来。秦的統一和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地巩固了封建經济制度。

恩格斯写道：“当自由地一旦变为可以自由出让的土地财产，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从那一瞬間起，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間問題了。”（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頁。）这个指示对于了解自战国到黄巾起义这一大段中封建經济制度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看。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山澤和未开垦的“草田”）和自耕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在土地自由买卖和封建国家的各項有利于封建主的措施之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地发展。于是，貴族、官僚、豪强和部分大工商扩大了自己的土地占有，因此到东汉年間，便形成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就是自耕农民日益失去自己的一块耕地，以及由此而轉化为依附农民的过程。农民的依附形式是多式多样的，是逐步加深的。从“傭耕”、“客作”最后轉化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徒附”。这个过程基本上在东汉年間完成。

因此，在这一大段当中，农民阶級跟地主阶級构成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基本特征和时代特征就表現为：农民反对封建主的土地兼并而維护自己的小块土地，反对封建主把自己轉化为徒附而維护自己的自由身分，跟封建主和封建統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斗爭。自秦末陈胜吳广項羽刘邦起义始，經赤眉綠林起义而至黄巾起义止，农民的阶級斗爭的实質都是这样的，所不同的是，这个斗爭越来越頻繁，越来越剧烈。把黄巾起义作为第一大段的下限，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在这一阶段中，封建經济制度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社会的面貌。但在各生产部門中，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奴隶制殘余，而部分大工商就是奴隶制殘余經济力量的代表。由于它的存在，就又形成为奴隶制殘余跟封建制的矛盾。由于奴隶制殘余不利于封建經济的发展，甚至它的发展又有损毁封建統治基础的危險，因而形成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国家政权对奴隶制殘余代表者大工商的抑制和打击（汉武帝統治期間盐鉄鑄錢三大利的收夺和算緡錢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反映）。更重要的是，这个矛盾尖銳地表現在：由于少数农民因奴隶殘余的局部发展（西汉更較突出），以至陷于高利貸的罗網而轉化为奴隶，因此每次农民战爭就又有着农民和奴隶反对奴隶制殘余斗爭的性質。

自耕农民是社会經济結构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从分裂走上統一，是由这个阶級力量促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統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政权是維护地主阶級利益的工具，虽然为和緩农民的反抗和維护代表国家政权的最高地主——皇室的利益，这个政权曾經許可农民墾辟或者“賜与”国有地，亦曾抑制过豪强地主和打击过大工商，但它的封爵封邑制度等等，維护了地主豪强的利益，而它的沉重的賦役，促成自耕农民的破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兼并势力的发展。而中央集权制的統治力量，恰恰随着农民的破产，日益削弱下来；豪强从“武断于乡曲”到攫取中央权力，因而最后到东汉，国家政权便成为維护豪族利益的工具，由此加速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进一步地激化了破产农民的反抗斗爭。

根据这一大段整个阶級斗爭形势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小段落。秦末农民战爭前是第一小段；赤眉綠林起义前是第二小段；黄巾起义前是第三小段。这一阶段的农民的阶級斗爭归結为：自耕农民反依附化（主要的）和奴隶化（次要的）斗爭。而在这一斗爭的总的发展中，上述各小段落的斗爭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从而表現了自己的特点。总的說来，这一系列的斗爭虽然失敗了，但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殘余进一步地被摧毁了，封建經济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而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进步的生产技术不仅在黄河流域江淮一带广泛推行，并传布到边緣地区，农业上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

第二大段。

这一阶段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封建主土地所有制，一类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前者特别是封建大土地制形成于东汉，而后者則是在前一阶段阶級斗爭中延續下来并发展成功的，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和北魏到隋唐的均田，都是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这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消長，跟这一阶段的阶級斗爭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下的农民，都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而在封建主大田庄下的部曲（农奴）和蔭附戶（半农奴），特别是部曲，較之束縛在国有地上的国家农民的依附关系更加强固。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进行了徭役和实物的沉重剝削，而封建主的实

物地租达到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因此，在这一大段当中，农民的阶級斗争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特征就是：反对封建主和封建国家的沉重賦役和掙脫封建依附关系的斗爭。

在这一大段中，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乃是分裂割据的基础。为兼并土地、控制臣民和取得賦役的割据战爭频频发生，而这种割据战爭又跟阶級斗爭錯綜在一起，从而使阶級斗爭的性質复杂化了。与此同时，国家政权的形式也因斗爭的复杂而有变化，它从分裂割据走上封建統一，又从統一再度陷于割据，但后一段的割据跟前段的割据有某些不同，这同样跟阶級斗爭有密切关联。

依据上述总的形势的发展，这一大段的历史过程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在各地豪强联合鎮压下去黄巾起义之后，据有堡塢之險的豪强迅速地扩大了他們的政治經济力量，为了强化对农民的控制，地方权力为之增長，三級制行政系統由此确立，国家分权从此表现出来。很明显，农民的阶級斗爭失败之后，地主豪强的势力增長了。这是一面。另一方面，在农民的阶級斗爭推动之下，同时由于豪族集团的矛盾，出现了屯田制。但在豪强势力增長之下，西晋皇朝于統一之后，立即以占田制形式，确立了世家大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和蔭附关系，同时以九品中正制确立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在此情况下，引起了阶級斗爭的新高漲，各地流民張昌、王如、杜弢和各族人民等形成为反对西晋世族統治压迫的斗爭。这是本段的第一个小段落。

自此以后，陷于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在北方，各族人民的阶級斗爭被各族統治者集团所利用，使之轉化为封建割据的战爭，最后統一在拓跋魏之下。拓跋魏的統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外部因素，可以作为本段划分小段落的再一界标。因为自此以后，奴隶制殘余又有所发展，这清楚地反映在北魏北齐的均田制中，因而此后的阶級斗爭又以反对奴隶制殘余作为一項任务。

在南北对峙当中，既有南北封建主集团的斗爭，他們利用各族矛盾而維持和扩大自己的土地；又有封建統治集团的內部斗爭。农民的阶級斗爭则由于割据的关系，而在局部地区爆发。如东晋南朝的孙恩、唐寓之起义，北魏蓋吳、葛荣等的起义。起义的性質亦頗复杂。如北魏六鎮起义与小貴族地主分子有密切联系；如南朝唐寓之起义与非世族地主有密切联系。而在統治阶級內部斗爭中亦常带有阶級斗爭的性質。例如侯景之乱对南方士族的痛斥和誅杀，不能不是阶級斗爭一个側面；而北魏末尔朱荣之乱亦具有这一性質。而这些斗爭，特别农民的阶級斗爭，削弱了世族的經济政治力量，使非世族抬起头来，正是在这基础上出现了隋朝的統一。

摆脫了割据混乱局面的隋朝，經济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旨在控制更多农民、取得更多賦稅和扩大更多土地的隋封建統治集团，利用强大的国家政权而把农民压迫得无以为生，从而阻碍了經济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隋末农民战爭。这是本大段划分小段落的再一界标。

經过前此一系列的阶級斗爭以及巨大的隋末农民战爭，唐朝社会經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均田制中的奴隶制殘余被消灭了，实物地租进一步取得支配地位，并且比以前也有所减輕，而农民在斗爭中消灭一些豪强士族，夺得一部分土地，这就使农业生产得到进步。手工业也因奴隶制殘余的消灭而取得显著的发展，手工匠人跟封建国家发生依附关系。

唐朝国家制度基本上从隋朝延續下来，并在某些方面加强发展。为扩大封建統治的力量和适应非世族地主的要求，科举考試制度建立起来。利用府兵制度，把地方豪族的离心力量轉化为向心力量，加强对各地农民的鎮压，进一步維护了集权統治。継承隋律而制訂的唐律亦发布出来。它一面維护豪族的土地所有制及其对部曲的控制，一面又維护封建国家的各种利益。

在經济的发展中，各种矛盾因素継續发展。非世族地主經济政治力量的膨脹，与世族殘余力量发生矛盾，更重要地是土地兼并因而猛烈发展，成为均田制破坏的外部因素，并成为唐中叶以后割据的基础。

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跟均田制下农民使用土地形成矛盾，而口分田又极端不足，租庸調的征歛則照章繳納，其他賦稅又紛至沓来，这就使均田制下的农民无力承担，不断以逃亡的形式，进行反抗。边防軍閥利用这一矛盾增長的机会，掀起反对皇室的斗爭，从此形成了皇室跟藩鎮的長期斗爭。

农民的逃亡，土地的兼并，均田制最后崩潰，唐王朝試图用括戶的办法重新把逃亡农民置于国家約束之下，这是徒劳的。因此，唐不得不以两稅制代替了租庸調制。两稅制是农民反抗斗爭的一个結果，它显示了封建国家对农民控制的放松，但它并不能作为封建社会內部分期的一个界标。两稅制主要以产业田亩征稅，但在当时条件下，不仅上田征稅少下田征稅大而使貧困的农民无力承担，而且徭役和其他賦稅又継續增加，加上藩鎮賦歛无度，最后爆发了黄巢大起义。

縱横全国的黄巢大起义，展示了农民的力量的巨大，使封建国家和封建主无法照过去那样把农民束縛到土地上。这使封建經济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黄巢大起义不但震撼了唐帝国，摧毁了世族門閥和豪族的統治，而且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之，黄巢大起义虽以失敗告終，但却是划分封建社会第二大段下限的界标。

第三大段。

在这一大段中，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長，而且由于城市經济的发展，商品貨币关系亦随而发展，并在明中叶出現了資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这一大段中，阶級斗争不仅复杂了，而且有了新的內容。但这一大段仍然是封建社会，农民仍然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农民的一系列的阶級斗争，不仅是反对沉重的封建剝削，而且自王小波、李順起义到明末农民战争，提出"均貧富"、"均田免賦"等口号，展示了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权力的愿望（这集中表現在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同时說明了阶級斗争的尖銳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而在本段后期，则又发生了城鎮市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所有这些不能不表露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特征。

必須注意到，經济的发展不是徑情直遂地发展着的，特别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民族矛盾剧烈发展的影响，使得經济发展更表現曲折迴旋的性質，这就又使阶級斗争表現了复杂面貌。因之，在这一大段中划分各小段时，必須考虑这个問題。

根据上面的总的形势，本大段基本狀况簡述如下。

黄巢大起义失敗后，全国形成为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是在外部矛盾刺激下，不久就成为統一的宋封建王朝。阶級斗爭的形势和封建統治經驗的积累，宋代专制主义制度有了重大的发展。自此以后，封建割据成为一种隐伏的矛盾因素。地主阶級的統治力量显得加强了。科举制大大地发展了，官僚制度更加完备，而募兵养兵制度成为地主阶級鎮压农民起义的重要工具。全副龐大复杂的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质，在黄巢农民起义失敗后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在思想方面，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統派理学提出的"餓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論調，积极地为封建专制統治服务。在宋代州县之学和书院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封建統治思想是封建統治阶級对抗起义的重要工具。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阶級斗争的新的发展。

在社会經济方面，五代以后，农业生产在手工业生产发展之下有了重要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在二石左右，有的地区达到三四石甚至六七斛。冶鉄、冶銅等手工业在規模上和技术上都有显著的发展。城市、鎮市、草市的发达反映了地方市場的活跃。商人資本的力量随之而发展。

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益衰落（到明最盛时仅占全部土地七分之一），地主土地所有制居于絕对优势地位，农民很少土地或没有土地，而无地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戶。封建国家仅以最高地主的身分向农民征收賦稅。而地主的土地亦多租給佃戶，这种租佃制日益广泛流行。因此这一大段开始就跟第二大段不同，即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这是第二大段农民战争的重大作用之一）。同时在商品貨币发展之下，出現了貨币地租。

經济上的这些現象，有其适应社会生产力的一面。但龐大国家机器和軍队成为社会的重負，經济的发展增長了封建主的貪慾。国家和地主田賦地租使农民极端貧困，更重要的是，土地的集中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因此，宋代小股农民起义不斷地爆发，而从王小波、李順起义到方腊和鍾相、楊么的起义，提出"均貧富""等貴賤"等口号，突出地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銳化。

宋江、方腊起义虽然失敗，但其时阶級矛盾仍在蓬勃发展，如果出現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打击經济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显而易見經济的发展会有另一番气象。然而正是在这时，民族矛盾有了新的高漲。女眞貴族的南侵和它在北方的統治，由奴隶制这一落后經济制度，使北方經济受到阻碍。因此，北方人民的不断的反金斗爭，具有这一意义。最后在紅襖軍起义冲击之下，摧毁了女眞貴族的統治。可是，接着女眞貴族而来的是蒙古貴族的統治，并且在127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它的統治。各种落后的經济因素，如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奴隶制残余的重新滲透，使社会經济呈現了局部倒退的現象。經过八十年的人民反抗斗爭，最后匯集为元末农民战争。元朝殘暴統治被推翻，阻碍社会发展的經济成分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从五代到元，民族矛盾和阶級矛盾交錯发展，应以此为綫索来划分这一段历史过程。女眞南侵前，阶級矛盾为主要矛盾；以后则以民族矛盾为主，而在金、元統治下这两类矛盾合而为一，因之元末农民战爭是划分第三大段的一个重要界标。

在元末农民战爭推动之下，明初經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然經济还居于支配地位，但由于城市經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貨币关系发展之下，到明中叶已經在長江下游三角洲一带地区上，有了資本主义的萌

一九三三年湘赣边区的查田查阶級运动

譚 双 泉

一 查田查阶級运动的偉大意义

1933年湘赣边区的大規模的查田查阶級运动是在一个极复杂极尖銳的形势下开始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举行的第四次反革命軍事“围剿”虽已遭受严重的挫敗，但这場斗爭并沒有完全結束，譬如在广东的敌人已进至寻鄔、安远，福建的敌人仍盘踞上杭、連城、清流一带，这对于中央苏区(湘赣边区)及邻近各县仍是一个較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敌人又在所有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积极策划下，向英、美、日进行大批的軍事借款，向德国聘請希特勒的軍事专家，并使用一切收买与利誘的手段，拉攏各派的反革命軍閥，准备一次新的第五次“围剿”，这样，更加严重的軍事斗爭任务，又摆在了年輕苏維埃的面前。

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又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公开叫喊“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南昌等处遍設軍警偵探机构，特别在南昌設总指揮部，专門組織与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企图从苏区和共产党内部来瓦解和破坏这支新型的革命力量，这一来苏区的反革命派别活动就更猖獗一时，如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以及各地的托陈取消派……等等，它們提出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动口号，如所謂“反对沒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拥护苏維埃，打倒共产党”……并暗杀党和紅軍的領导人，阴謀暴动，以便和反动派的上述的軍事“围剿”直接配合起来，实行里应外合。

当时紅色根据地的情况，由于苏維埃运动的发展异常迅猛，已建立了將近一万万人口的苏維埃中国；在一切可能的地区都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特别在閩西与赣西南彻底实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綱，这說明苏維埃运动的偉大成就。但是随着革命規模的迅速扩大，革命基础还需要有进一步的巩固，特别由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的根子很深，加以我党当时还缺少直接的丰富的土地斗爭經驗，因而使得許多地区的土地問題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在中央苏区几乎就有80%的面积和二百万以上的人口地区，沒有彻底解决土地問題，这样就給了反革命派别活动猖獗的机会。正如1933年6月間中央政府所召集的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長汀八县区以上苏維埃負責人員

芽，在北宋即已出現的“机戶”，到这时它无論家庭大作坊或手工工場，已經帶有了資本主义色彩。这就使明代阶級斗爭具有新的面貌。

但封建經济制度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土地高度集中和賦稅的沉重，依然成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因素。邓茂七、叶宗留在閩浙的起义，刘通、李原在荆襄山区的起义，刘六、刘七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各地的起义，都反映了农民爭夺土地斗爭的剧烈和反封建压迫的力量的巨大。这些斗爭推动了經济的发展。一条鞭法就是在这些斗爭和商品貨币发展刺激下出现的。这个稅制进一步反映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的意义虽然重要，如果不从明代經济发展和阶級斗爭的特点加以理解，并且認为这是普遍的貨币地租，而把它当作封建社会分期的一个界标，那就过分强調了它的作用。

尽管明代中叶以后爆发了城鎮市民的起义，农民起义中也常参加有手工工匠（如矿工等），但由于資本主义处于萌芽阶段，这些斗爭都是孤立进行的。因之，被維护封建經济制度的明統治政权鎮压下去，专制主义封建統治愈来愈甚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爆发了明末农民战争。

如果明末农民起义在摧毁明帝国的基础上，狠狠打击封建主，而不被清朝貴族窃夺斗爭胜利的果实，那必然会促使資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这一历史行程在清封建統治下受到阻碍，虽然在明末农民战争推动下，清朝实施了“攤丁入亩”的制度，减輕了农民的

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結論指出，苏維埃运动取得了偉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說苏区中已經没有严重的問題了，正因为土地革命与苏維埃运动的猛烈发展，一切苏区外的与苏区內的阶級敌人，都瘋狂地进行他們的絕望的掙扎与抵抗。在苏区外敌人是采取了軍事的进攻，在苏区內則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是地主富农及一切阶級异己分子把自己的反革命真相隐藏起来，利用苏区中許多地方的土地問題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他們中間的許多分子还保持着一些經济的根据，即如許多地主分子的土地財产还没有完全沒收，許多富农分子还分好田，許多这些份子还被他們混进在苏維埃机关中、群众团体中、与地方武装中，他們就濫用苏維埃的威权，压制群众斗爭的发展，欺騙收买威胁一部分群众，散布謠言，組織秘密团体，……作出各种阴謀搗乱的活动。这样的情形，在中央苏区的多数地方竟时常发现出来”。如当时胜利县古龙崗蜈蚣山，就曾发生两个地主、一个富农和两个道士趁战爭后发生的瘟疫与牛瘟，向群众恐嚇說：“現在要換朝了，要天翻地覆了，不敬菩薩的就要滿門死絕。”这样引动了几十个农民天天“发神”，良村、东村、城崗、方大等区的地主富农也同样发作起来，甚至鬧得向苏維埃政府繳槍。这种封建残余势力的阴謀活动，恰恰又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所組織的上述反革命派別活动的社会支柱和天然的同盟者，它們匯成了一股反革命的逆流，在苏維埃的許多地区泛濫成灾。革命队伍內部也发現了不少阶級异己分子，如“信封赤卫队官長都是富农”、“上犹党員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內有靖卫团总”（見“农村調查”，第55頁），由于阶級异己分子的混入苏維埃机关中，因此在土地斗爭中“沒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农民”，象儒林区“大多数乡名分实未分，因为尽是A·B团在那里主持”，平时“就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員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見“农村調查”，第75頁），因而，在这些地区就使党和苏維埃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根据上述情况党認为要認真地組織第五次反“围剿”斗爭的胜利，首先应該进一步巩固苏維埃区的內部，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派別活动和封建势力的残余，彻底改造某些苏維埃和党的机关，使苏維埃运动奠定在鉄一般巩固的基础之上。要这样，关鍵問題就在于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彻底解决土地問題，通过一場更加深刻的土地斗爭，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因此正如当时八县大会所指出的：“为了最后的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的解决土地問題，鉄一般的巩固苏維埃政权，必須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在逼着的敌人面前，不但不能放松查田运动，而且要加倍努力去开展查田运动，必須在查田运动中迅速的爭取几百万群众都积极起来，消灭敌人的內应分子、地主、富农的残余势力，建設鉄一样巩固的苏維埃，战胜敌人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了”（以上引文見“八县区以上苏維埃負責人員查田运动大会通过的結論”）。因此开展一个查田查阶級运动就成了当时“党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工作，是一切工作彻底轉变的一个枢紐”（湘贛省委1933年8月14日“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議”）。

为什么这样說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具体的考察：

（一）查田运动与肃清反革命的斗爭。由于苏区反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自己的真相隐藏起来，冒充农民与苏維埃工作人員，組成一个个的秘密团体，进行各种潜伏的破坏活动，这样要把他們全部清查出来，就必須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采取肃反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結合，即領导与群众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如八

人身依附关系。另外，資本主义萌芽也得到継續发展。所以明末农民起义应該当做第三大段划分阶段的一个界标。

滿洲貴族侵占中国后，他們勾結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官僚地主上层分子，共同压迫各族人民，把各族人民置于民族牢獄的統治之下，形成了异常残酷的阶級和民族双重压迫的封建极权制度，引起了各族人民紛紛起义，自清入关起，到鴉片战爭前，始終沒有停止过，而且起义的浪潮越来越激烈壮闊，到了十八世紀末頁，形成反清斗爭的高潮。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使得清朝的統治搖搖欲墜，动蕩不安。清封建国家和它的各种制度，阻碍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級和它的統治，終将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打碎。这时，鴉片战爭发生，外国資本主义侵入，清封建統治阶級跟外国資产阶級勾結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使中国开始轉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了。

× × ×

上面有关封建社会的分期分段自然是极不完备的，但比过去显然进了一步，从而有利于把历史講解为阶級斗爭的历史，有利于闡述封建社会发展的規律，更有利于使古史为今服务。今后，通过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踐，将会使这个分期分段得到修正补充，使之日臻完备。

县区以上苏維埃負責人員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結論所指出："查田运动中的肃反，主要跟着群众查阶級的斗爭，指导群众报告消息，追寻反革命綫索，以至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查田运动期中，准許保卫局特派員有逮捕犯人之权，逮捕了經过特派員的預审，提交区裁判部审判，重要犯人要在犯人居住的乡村組織巡迴法庭，当着群众面前公开审判"。这样就有效地肃清了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又通过肃反斗爭提高了群众的敌情观念和革命警觉性，这是將查田运动和肃反斗爭有机地結合起来的最好方法。

（二）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党和苏維埃机关。如上所述，由于苏維埃运动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切阶級敌人的惊慌，他們在許多地方利用土地問題没有彻底解决，混进了地方党和苏維埃机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方針政策的貫彻，同时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查田运动的眞实开展，將毫无問題地联系着党和苏維埃机关工作的改造和加强，必須在查田运动中結合农民群众的斗爭来清洗一切混入党与苏維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暗探，提拔在斗爭中湧現出来的新的力量、新的干部，以健全与加强党与苏維埃机关的工作，在必要时进行苏維埃的全部选举"（1933年6月1日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議）。

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改造地方党和苏維埃机关的工作，是分为清洗坏分子和提拔积极的优秀分子这样两个方面。

关于清洗坏分子。县与区的工农檢察部負有主要的責任，其方法是跟着"查阶級"斗爭的发展，乡一級組織檢举委員会，在区工农檢察部的直接領导之下，开展群众性的檢举运动，檢举的目标，主要是乡代表会混进来的阶級异己分子与完全离开工农利益向地主富农投降妥协的分子。其步驟是：（1）將这些分子列出名单，搜集罪狀，通知全乡群众发表意見；（2）收集群众意見后，檢举委員会做成結論；（3）提到乡苏維埃代表会討論，通过开除或其他处分的决定；（4）报告区苏維埃工农檢察部，經过区苏主席团的同意，用工农檢察部名义向全乡群众布告处分結果。在檢举运动中，工农檢察部的突击队、通訊員和控告箱都充分发揮了作用，对那些罪惡严重的分子，还要經过群众审判会的审判，交与裁判部依法制裁他們。这种檢举运动和公审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充分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彻底清除苏維埃中的一切阶級异己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另一方面又用这些活人活事的生动的現实材料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們的阶級覚悟和革命警惕性，这样又进一步地激发群众的查田查阶級的斗志。

关于选拔斗爭中的积极分子。第一，乡一級召集选民大会，选举在各项运动特别是查田斗爭中最勇敢坚决的分子到乡代表会来，补充那些被洗刷出去的坏分子的缺額；第二，要吸收大批新的积极分子进乡苏管轄下的各种委員会来，如土地建設委員会、山林委員会、水利委員会、教育委員会、拥护紅軍委員会等等，使这些委員会眞正建立并扎实地工作起来；第三，在今后全苏区的总选举中，务必要使查田斗爭中多数积极分子都能当选到乡苏中来，区一級、县一級的补充人員，采取同样的选拔办法。

由此可見，經过查田查阶級斗爭的眞实开展，不但純洁了党和苏維埃的內部，使群众斗爭得着了新的坚强有力的直接領导力量，同时又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进一步激发他們的政治热情，从而大大地加强了查田查阶級斗爭以及其他各項革命工作的継續深入的开展。

（三）查田运动与經济文化建設。既然查田运动是彻底解决土地問題的重要步驟；它一方面把隐藏在中、貧农中的地主、富农清查出来，重新没收、分配了他們的土地財产，彻底地消灭了一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殘余；另一方面又按照"土地法"的精神，适当地調节了农民內部的土地分配的不够合理的現象，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了雇貧农与中农的手里，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苏区的經济建設开辟了广闊的道路。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經济建設的战綫上来。"（"毛澤东选集"一卷，第119頁）。

此外，随着查田运动的深入开展，被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的数目比前增加，没收过来的財富也就增多了，这对于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困难問題，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来源，也就是为苏区的經济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如1933年江西兴国县上社区長岡乡就曾將查田中所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子約十余石解决青黃不接时的粮荒問題，所有这些，对于苏区的經济建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苏区經济建設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是加强流通。发展生产的紧急任务，就是"在查田运动中，努力进行秋收秋耕的工作，要組織劳动互相社、割禾队、秋耕队，加紧收穫与耕种"（1933年7月八县貧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議），首先帮助紅軍家屬和紅軍公田的收穫和耕种，而后才进行彼此間的群众性互助运动，他們的口号是："不使有一穗谷子落在田上，不使秋收后有一丘未种杂粮蔬菜的田。"所謂加强流通，是指努力发展合作社事业，調剂粮食，活潑金融，把苏区土产輸出白区去換回食盐和布疋。这种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是很迅速的，比如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到1933年12月就有了十四个消費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人家占总

人口60%以上；瑞金在1933年8月以前只有九千人的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和一万一千元的資本，到9月底社員新增加五千三百人，資本增加五千五百元；粮食合作社原来很少，这时也增加了六千八百人的社員和八千九百元的資本，群众反映，“合作社第一好”，“就是当衣服也要加入合作社”。所有这些，都具体表明了轟轟烈烈的查田查阶級运动对于苏区經济建設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查田运动的胜利也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群众在取得政治上和經济上的革命胜利后，接着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文化革命的要求，同时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查田，必須印发各种簡明通俗的課本与小冊子，供一切查田干部与广大群众閱讀，向他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兴国县当时就差不多达到了在千人中建立一个俱乐部，五百人中一个小学，百人中一个夜校，十六岁以上大多数都进識字班的成績。

（四）查田运动与战争动員。根据毛主席1933年8月的指示：“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圍剿’的战爭的彻底胜利。”（“毛澤东选集”一卷，第113頁）因而查田运动的开展，毫无疑問地也是直接或間接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服务的，因为用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离开了这点，就是查田运动的本身也是无从开展的。

查田运动是怎样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呢？首先由于在查田运动中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純洁党与苏維埃机关內部的工作，这就巩固了工农紅軍的后方，給敌人里应外合的軍事圍攻的阴謀計划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地支援了紅軍前綫的胜利；同时，由于查田运动的胜利开展，彻底摧毁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就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的經济文化建設工作，这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軍事“圍剿”所采用的經济封鎖政策，更重要的是在物質条件上保障了紅軍的給养和供給，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相当的物質基础。特別重要的是，当时广大雇貧农和中农群众，經过查田查阶級运动这样一場系統的激烈的阶級斗爭的訓練，普遍地提高了他們的觉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加以在經济生活上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使他們支援革命战争与参加革命战爭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了，这无論在扩大紅軍与購买公債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在查田运动胜利后，如長岡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16岁至45岁，以下同）407人，出去当紅軍做工作的320人，占80%；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外出当紅軍做工作的485人，占88%，又全乡513家2,318人，購买公債4,000元，平均每家約7—8元，其他各地也有如是情形，足以說明，查田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和充实了革命战争的力量。

綜合上述情况看来，查田查阶級的斗爭，成了当时湘贛党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工作，是一切工作彻底轉变的一个枢紐；这个查田运动在当时的偉大現实意义，就完全可以明白了。

二　党在查田运动中的阶級路綫和阶級政策

查田运动的偉大意义已如上述，那末这个运动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这里，貫澈党的阶級路綫和阶級政策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共中央局在1933年6月2日“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議”中指出：“正因为查田运动是个剧烈的阶級斗爭，因此明确的阶級路綫，是保証这个运动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說我們应当最清晰的分別农村各个社会阶层，与采取对于他們的正确与适当的策略。”

关于党在查田运动中对于农村各个社会阶层所采取的正确与适当的策略問題，“决議”接着指明：“这里，党的正确的策略，应該是依靠雇农及貧农（农村中无产阶級及半无产阶級），与中农群众結成巩固的联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鋒队的領导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級的残余势力，削弱富农經济上的势力，与打击他們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根据現在所有的經驗，在执行这个总的策略路綫的时候，应該特別注意的是，第一，加强与发揚雇农及农村中的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領导作用，因此苏維埃的工作人員，必須与工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經过工会来发展与組織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們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鋒；第二，必須特別的注意到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維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們的处置与策略，必須获得他們的贊助和拥护，每一个貧农团与苏維埃的决定，必須在以村或屋的群众会議上，得到中农群众的了解与拥护，一切中农群众的呼声，須最注意的傾听，并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的企图；第三，必須把地主和富农分別清楚，在无情地消灭地主残余的斗爭中，决不能容許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193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議）

根据中央局的决議精神，在貫彻执行党的阶級路綫的过程中，当时特別注意三个問題。

首先是关于发揮雇农貧农在查田运动中的先鋒作用問題。为了揮发农村中的雇貧农应有的作用，1933年8月24日中共湘贛省委印发的“怎样进行查田运动”一文中特別指出：“貧农团应成为发动和深入查田运动最主要的群众組織，必須在查田中来扩大貧农团組織，健全貧农团的工作。”这也就是說，要在查田运动中充分发揮雇貧农的先鋒作用，首先应該从扩大与健全貧农团的工作入手，因为在查田运动的初期，有的地方的貧农团还操縱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或者散漫不起作用，这就必須在貧农团內发动激烈的斗

争，坚决把地主、富农分子及个别的无法再教育的极坏分子洗刷出貧农团去，这样就健全了貧农团的組織，坚强了它的战斗力量。

貧农团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和作用是很大的，首先在成立查田委員会的时候，都必須經过雇农工会和貧农团的討論并提出名单，而后由政府批准；

一般在乡查田委員会的11个委員中，雇农工会和貧农团的代表則占6人以上，这就保証了雇貧农在查田領导机构中的絕对优势。

随着查田运动的开展，在党支部和查田委員会的具体領导下，雇农工会和貧农团一方面要广泛地发动自己的成員积极参加揭发檢举工作，另一方面又需协助查田委員会，将群众举发出来的材料，进行实地調查对証，将地主、富农各种复杂的剝削作恶情形一概查出来，如果牽涉到中农的誤报，也需証明不能成立。在这个基础上，雇农工会和貧农团需要召开会員大会，认眞討論并通过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的阶級成份，再交乡苏通过，由区苏批准，可見在决定阶級成分的过程中，雇农工会、貧农团和广大雇貧农群众是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

在执行没收分配时，也需經过雇农工会和貧农团的充分討論，然后开单、出榜，这样才能使雇貧农、中农和其他应分土地財物的工人得到应得的利益，不侵犯中农，也不使富农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

此外，以查田运动为中心的其他各項工作的配合，如紅軍公田的抽留、扩軍、优属、战爭动員、农业建設、生产开荒、救灾防疫以及苏維埃的选举等等，都必須經过雇农工会和貧农团的充分討論，从而向政府和有关方面积极提出建議。这就为各項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同时又使这些方針政策在群众中的貫徹执行得到了重要的組織保証。

其次是关于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問題。1933年7月15日中央政府頒布的“貧农团組織与工作大綱”中規定，“貧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与权利，使中农环繞在貧农团的周围，建立貧农团与中农的坚固联盟，成为无产阶級联合中农坚固的一环”。在查田运动中，也确实貫澈了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原則精神。如在查田运动的宣传动員阶段，就利用各种群众会議、晚会、化装演講、农村小报、墙报等方式，大規模地反复地宣传查田运动的意义和具体政策，結合当地情况彻底揭破地主、富农动搖中农的阴謀活动。这样使广大的中农群众旣了解查田运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又明确了划分阶級成分的标准与方法，从而消除了各种顧虑，积极投入了查田查阶級的斗爭。

同时在查田中，也审愼地划清了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間的疑似成份，防止一切把富裕中农也当作富农来处理的錯誤傾向。另外貧农团在召开会議討論和确定举发出来的地主、富农的阶級成份时，也邀請了中农参加傍听和发表意見，以激发他們参加檢举斗爭的热情。

在分配没收过来的土地財产时，对过去土改中中农分得坏田太多的，也补給了一些好田（但过去土地改革中将中农土地拿来平分了的，不必提出归还原有土地，因为这要从貧农雇农手中抽出一部分田，会使广大雇貧农不滿），并且还注意了中农中的个别貧苦分子，适当地分給土地財产，不使向隅。

其他工作，在保証雇、貧农的領导优势下，也吸收了一定数量的中农代表参加，以发揮他們在各項工作中的革命积极性，并使之受到深刻的阶級斗爭的教育，从而有利于巩固雇貧农和中农的联合。

第三，关于分别地对待地主与富农的問題。列宁在1918年談到俄国反富农斗爭的問題时，就曾提出：“我們没有說对待富农要像对待地主資本家一样，没收他們的全部財产……。”（載“学习譯叢”1955年第4期）我們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一直遵循着列宁的这个指示精神制定了自己的政策。在查田运动中有些同志曾混淆了这一政策原則，对待富农也像对待地主一样，没收他們的家产，并实行罰款等等，毛澤东同志便即时地批評了这种錯誤，他說：“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没有发現公开消灭富农的理論，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經在許多地方发現了。这一錯誤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1933年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結）

另一方面，为了揭破豪紳地主和反动富农在土地斗爭中的反革命活动和一切阴謀詭計，党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又具体規定：“凡富农以上的經济地位，經証实坚决反水逃走的和参加白軍武裝組織的反革命首領，本人及其家属的土地一律没收”，“豪紳地主及反革命的富农的妻女用接郎的办法，与工人雇农貧农中农結婚企图保存原有土地財产者，政府仍須将其没收”，“豪紳地主反动富农的老婆媳妇儿女和工人、雇农、貧农、中农結婚的，以及貧苦工农收容豪紳地主儿女一律不得分給土地”（1932年8月2日湘赣省苏維埃执行委員会：“經济政策执行条例”）。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反革命企图，更好地保証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全部落在雇貧农和中农的身上，它和对待守法富农的政策，自然是另外一回事。

发揮雇貧农的先鋒作用，建立雇貧农与中农的巩固联盟，有計划有区别地对待地主富农阶級，这是党在农村土地斗爭中的系統的阶級政策的三个重要环节，在查田查阶級的斗爭中也和在土地改革中一样，党正确地运用了这个阶級政策，才保障了查田运动的胜利。

本刊啓事

本期临付印时，有一篇文章因故撤下，少了四頁。由于时間关系，来不及改登別的文章，所缺頁数，本刊当于十二月号补上，希讀者鑒諒。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

B.A. 柯久琴科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是德国貴族地主和資产阶級的帝国主义的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結果。它是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求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德国的政治危机在战爭前几年本已成熟。因此，德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世界大战，他們不仅妄想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重新分割世界，而且还企图利用战爭巩固自己的政权、預防革命的爆发。但是，发动战爭的結果，使得帝国主义德国的社会經济发展起了变化，这就更促使了帝国主义德国內部矛盾进一步尖銳化。

在战爭期中，加快了壟斷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斷資本主义的过程。战爭使資产阶級和貴族地主大发橫財，而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貧穷和痛苦。

由战爭造成的这种窘境，使群众的不滿情緒和反抗心情不断增長。"战爭激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灾难和痛苦喚醒了他們。。"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和职工会的領导人，从战爭一开始，就公开地轉到本国資产阶級的一边，站到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力量。

德国反战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同以卡尔·李卜克內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克·蔡特金、威廉·皮克为首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分不开的。左派社会党人在极其困难的秘密的条件下，提出了"主要敌人在国内"的口号。开展了反帝主义、打倒反动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推翻战爭政府的英勇斗爭。李卜克內西的名字成为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象征。在1916年1月左派联合成"斯巴达克团"，这就是德国共产党的萌芽②。

俄国二月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大大地推动了德国革命危机的发展。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次大規模的反战的政治罢工于1917年4月爆发了，德国工人在这次罢工期間，第一次提出建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要求。

为了不使对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不滿的工人継續左傾，保持中派对他們的影响，和为了阻撓眞正革命政党的建成，中派就在1917年4月，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革命工人是該党吸收普通党員的基本对象，可是，他們实际上却是处于中派領袖考茨基、哈阿茲等人的影响和支配之下③。斯巴达克派雖然批判考茨基分子的机会主义，但是他們沒有走上独立建党的道路，并且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就把同中派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的良好时机錯过去了" ④。

德国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爭，在1917年，在德国处境"……从日益严重的飢荒、破产和破产看来，……十分惡劣，毫无出路……" ⑤的时候，継續尖銳起来。

罢工、街头游行示威和飢荒騷动的浪潮，在1917年5至7月，席卷了上西里西亚、魯尔区、薩克森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反战思想和对反动制度的不滿情緒，日益深入于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的心中。

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东方战綫开始发生俄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广泛的联欢运动。

1917年8至9月海軍水兵中反战的革命运动，是1917年德国革命运动的最高潮。列宁写道："无庸置疑，德国艦队中的起义标志着世界革命日益增長的巨大危机。" ⑥

---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136頁。

② 35 Jahr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1955, s.8.

③ 中派是用"左的"詞句，用对兼并行为和对帝国主义口头譴責来掩蓋自己叛变政策的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中派領导阻撓无产阶級革命斗爭的策略并力圖利用綱制的欺騙宣傳使工人們只限于对政府施加合法压力，求得"协議的和平"和民主化；它鼓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团結。

④ 威廉·皮克："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7年版，第10頁。

⑤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5頁。

⑥ "列宁全集"，第26卷，俄文版，第151頁。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的影响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德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同对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加强了德国工人阶級的革命力量，鼓励他們进行斗爭以制止战爭和推翻帝国主义政府。苏維埃共和国成为各国人民在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爭中堅强可靠的支柱。

十月革命的消息和苏維埃政府关于和平的法令，受到德国工人和士兵万分热情的欢迎。

早在1917年11月，德国各地就举行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的許多集会、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同苏俄締結表示团結的民主和約。东方战綫上的联欢是有群众的性質。战綫上的許多地方，还在开始停战談判以前，就締結了“士兵的和約”。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領导，千方百計处心积虑来削弱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人的影响，不让他們轉而采取爭取和平的“俄国办法”，并开导工人說德国正在“民主化”、說格特林政府正在施行”民主政策”。1917年10月底成立的反动分子格特林的政府，收容了国会中資产阶級政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就把这回事說成是“民主化”的巨大成就，虽然这个政府实际上仍然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传导者。

斯巴达克派是群众革命意志的表达者。他們热烈拥护十月革命，他們闡发它的国际意义，并号召德国工人保护它和支持它。受到俄国工人阶級胜利的鼓舞后，斯巴达克派更加精气勃勃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們在十月革命不久后散发的传单“决定的时刻”里写道：“工人阶級只有在德国实行革命和建立人民共和国，才能够結束兄弟相残的战爭和保証普遍的和平。只有这样，才能够援救俄国革命。”①

較諸协約国被战爭削弱得更多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人民爭取和平运动日益增長的情况下，不得不同苏俄进行談判。但他們却想把兼并土地的和約强加給苏維埃国家。

为了回击德奥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对苏維埃共和国提出的蛮横无理的、兼并土地的要求，按照“斯巴达克”的号召，1918年1月28日，柏林发生了工人大規模的政治罢工。罢工的第一天，就有軍需工厂和其它企业将近四十万的男女工人停止上工。各工厂的集会选出了工人苏維埃的代表。工人苏維埃对1月28日提出根据苏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提建議的基础上，最迅速地締結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并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工人苏維埃号召德国和其它交战国的工人举行爭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总罢工。为了領导罢工，設立了中央行动委員会。但柏林工人代表苏維埃犯了一个致命的錯誤，它不仅邀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且也邀請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派代表参加行动委員会。于是，改良主义的工賊艾伯特、謝德曼等人进入了罢工的領导机关，并且利用在其中的地位来更加迅速地扼杀罢工②。

与罢工运动同时，柏林出現了大規模政治性游行示威、构筑街垒和同軍警公开冲突的事件。罢工越出了柏林，遍及全国各大工业中心，席卷了二百万左右的工人③。

为了对付罢工工人，政府采取了暴虐恐怖的办法：实行戒严，进行大逮捕，成立特別軍事法庭，把几万工人送上前綫以及其它。但这些办法破坏不了工人的斗爭意志。罢工之所以被鎮压下去，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反动首領的叛卖行为，他們在行动委員会中通过了从2月4日起停止罢工的决議。

1918年1月間德国工人斗爭的进程表明，德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弱点，是它缺少一个眞正无产阶級的政党。斯巴达克派准备了罢工，并力求将它扩大，可是，他們不能在罢工的領导机关中实行自己的路綫。斯巴达克派“缺少一个能够在罢工領导机关中，特别是在中央行动委員会中，保証行动統一的党組織”④。“斯巴达克”延迟同机会主义的决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这次革命中表現出来了。

1918年1月的罢工，是大战时期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再一次地表明了十月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級的巨大影响，它标志着“德国无产阶級心緒的轉捩点”⑤，“它是1918年推翻威廉二世統治的总演习”⑥。

帝国主义德国經济、軍事和政治局势，在1918年

---

①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2, 1957, s.51.

② 参看威廉·皮克：“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第19頁。

③ 参看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 2, s.106.

④ B.烏布利希：“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載“近代史和现代史”1957年第5期，第7頁。

⑤ “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505頁。

⑥ W. Ulbricht, Über Gewerkschaften, Bd. I, 1953, s.18.

更加紧張起来。革命危机不可遏制地愈益增長。

从烏克兰掠夺来的資源，并沒有把德国和他的盟国从粮食恐慌中拯救出来。同苏俄的接触，革命化了德国的士兵。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預决了德国的战敗。个别的部队中出現了士兵苏維埃。用反对指揮部关于調赴西綫之命令而爆发的士兵叛乱事件和士兵起义事件越来越多。开小差的現象也加多了。

德国軍队內部瓦解的进程，由于1918年春夏两季德軍在西綫上的失敗而更形迅速。

迁延不决的战爭使德国經济資源和人力資源枯竭了，使工人和劳动人民极端地貧穷和破产了。德国在战爭中損失了七百五十多万人，其中陣亡的和失踪的有二百万上下。工业生产在1918年降为战爭前一年的57%。粮食和馬鈴薯的收获量减少了一半。劳动居民忍飢挨餓。衣服、靴鞋、燃料都感奇缺。从1915至1918年交战的三年当中，德国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一百五十万①。而在劳动人民生計日蹙的时候，資本巨头和貴族地主却在継續大发其財。

一月罢工以后，工人爭取擺脫战爭的革命斗爭，一刻也沒有停止过。革命运动的規模越来越大。苏俄在巩固无产阶級专政事业中的成就和苏維埃国家所徹底实施的和平政策，大大地帮助了德国工人的斗爭。

反战性的集会和群众大会，飢餓騷动，罢工事件，在德国各地都日益頻繁地发生。从1918年3月至10月，德国就大約发生了二百次罢工②。列宁在估計1918年夏天德国局势的时候曾經指出：那里已經具备了巨大的革命的力量，这个力量的表現必將一定不移地到来。”③

1918年秋季，德国帝国主义軍事崩潰的时候来临了。軍事崩潰的影响，特別是由于不堪忍受的災难局面，使群众的革命义憤激增起来。

德国的政治危机愈益加深了。列宁在說明德国的政治危机时指出，德国政府和各个剝削者阶級都在惊慌失措，劳动群众已不給統治阶級任何支持了④。

1918年9月29日，德軍最高統帅部要求政府立即开始停战求和的談判。10月3日，成立了新的、以軍閥走狗馬克斯·巴登斯基为首的、有資产阶級各党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的所謂“国会政府”。这是德国帝国主义反动集团指靠通过假的民主化預防革命爆发和力求損害苏俄以便同美国帝国主义与协約国各国締結妥协性和約的一个手段。

右派社会民主党号召工人拥护政府，保卫据說是业已在德国实現了的“和平革命”。

“独立派”的領导也帮助資产阶級，不让工人采取革命行动，它告訴工人說，德国內閣的变动已經“摧毁了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部体系”。“独立派”的报刊，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刊一样，力求破坏德国工人对苏維埃国家的同情。

只有左派，即斯巴达克派，才站在革命的立場。1918年10月7日举行的，有不来梅及汉堡左派激进党参加的斯巴达克派全德代表会議，宣布群众革命斗爭的任务是：立即停战，沒收壟断資本家、貴族地主和战犯的財产，消灭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物質基础，推翻貴族地主和資产阶級的国家。会議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苏俄联盟的口号，通过了爭取普遍建立工兵苏維埃的决議⑤。

“斯巴达克团”的这个行动綱領，确定了业已成熟之革命的目的和方針。列宁在1918年10月18日給“斯巴达克团”的信中对它的工作給予很高的評价，并且指出，它“实实在在地挽救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和德国无产阶級的荣誉”⑥但这个綱領中有着一个严重缺点，即不了解工人阶級同劳动农民联盟的必要性。

同年10月，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和集会的浪潮又席卷了各个工业中心。工人和劳动人民要求停止战爭，推翻君主专制的帝国主义政府，表示同情苏維埃俄国。由于“斯巴达克团”和左派激进党人的活动，在开姆尼斯、斯图加特和其它許多城市里，都出現了秘密的工兵代表苏維埃。

反战的革命情緒日益深入到前后方士兵和水兵当中。城乡小資产阶級群众日益憎恨战爭罪犯。列宁曾指出，“……德国內部的反帝力量开始猛烈地发展起来”⑦。10月23日，由于群众压力而被釋出獄的卡尔·李卜克內西来到了柏林。首都工人都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以李卜克內西为首的游行队伍开赴苏俄大使館，表达他們对苏維埃人民的兄弟敬意。

1918年秋天，德国全民性的革命危机醞釀成熟了。

社会主义革命被德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提上了

---

① A.諾尔金：“柏林与莫斯科之間”，1956年莫斯科版，第194頁。

② 参看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2,s.531——532.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505——506頁。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5頁。

⑤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2, Berlin, 1957,s.228——231.

⑥ “列宁全集”，第35卷，俄文版，第306頁。

⑦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6頁。

議事日程。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业已具备了。

德国的革命斗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造成的世界新局势中，在資本主义总危机和資本主义工人运动高漲的条件下，开展了起来。德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着象苏維埃国家这样眞誠的朋友和眞誠的卫士。

但是，工人阶級直到革命开始时还没有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并处于深刻分裂狀况的这个事实，对于德国革命斗爭的发展，起了一种致命的危害作用，列宁写道："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險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謝德曼之流、列諾得尔之流、韓德遜之流、韋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沒是革命的政党。

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糾正这个缺点，但它現在还是一个大不幸和危險。"①

1918年11至12月革命的开始和經过　共产党的成立

德国軍閥拖延战爭的行为，成为人民起义的导火綫。10月底，海軍統帥部命令駐基尔的軍艦駛出公海，进攻英国艦队。統帅部在准备进攻战的时候，还打算分散艦員，打断他們同岸上的联系，預防水兵的革命发动。

水兵們識透軍閥的奸計以后，便拒不执行命令。接着发生的大逮捕更加深了軍艦上公开的憤懣情緒。11月3日水兵們发动的起义获得基尔各企业和造船厂工人的支持。調来鎮压起义的士兵，不是被迫繳械，就是倒向起义者的一边。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維埃成立了，它执掌基尔政权达数日之久。

基尔的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端。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起义便蔓延到了德国的全部大城市。到处都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維埃，这一点表明了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級的巨大影响和苏維埃政权的国际意义。

德国政府被劳动人民对苏維埃共和国日益增漲的同情吓得要死，并力求竭尽全力勾結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在11月15日断絕了同苏俄的外交关系。

社会民主党的領导图謀阻止柏林工人的发动。但是，同保皇派社会主义者的意志相反，11月9日，柏林几十万工人在"斯巴达克"和革命工長的实行总罢工和起义的号召下，停止了工作，走向市中心。有部分士兵归并于革命工人。

于是，当权阶級采用了挽救帝制的最后一着。他們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身上。馬克斯·巴登斯基宣布德皇退位以后，把帝国首相的职务交給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艾伯特則声明，他将根据帝国宪法，即根据君主专制的宪法，来处理政务，并号召工人离开街头，"保持安宁和秩序"。社会民主党并背地里同各資产阶級政党匆促談判新政府的人选問題。

可是，卡尔·李卜克內西这时却从柏林宮的晒台上向成千上万的示威工人和士兵宣布德意志成立了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热烈地对苏俄表示敬意。

社会民主党右派領袖保存君主专制的企图失败了，他們不得不赶快見风轉舵。他們想継續自己叛变工人阶級利益的事业，于是便搖身一变，迎合新的局势。

李卜克內西发表演說后两小时，謝德曼就从国会的晒台上宣布："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成立。

1918年11月人民起义結果，霍亨索倫朝被推翻了，其它日耳曼国家的王朝也一并垮台了。德皇威廉二世逃到国外。工兵代表苏維埃到处成立。列宁写道："德国（它是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一个特別重要和典型的国家）革命一开始就采用了'苏維埃'形式。"②工人阶級爭得了一般民主自由的权利：党派与結社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男女平等的普选制，政治犯大赦了。戒严狀态、劳动义务法、中世紀的"貴族条例"等被废除了。

在十一月革命中，进行斗爭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光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度，他們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也表现于許多工兵代表苏維埃都宣称自己目的是求得社会主义的这个事实上。例如，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开姆尼斯工兵苏維埃統一代表会議告薩克森劳动人民的宣言中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級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須掌握国家权力；列入宣言的要求有：没收私有的土地、矿山业、冶金业、原材料、銀行、机器、交通工具和其它，普遍武装人民，撤消資产阶級的法庭③。

斯巴达克派通过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紅旗"和在大量的传单中，号召群众深入斗爭，把革命一直进行到无产阶級夺得政权。"斯巴达克团"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建立无产阶級赤卫队，剝夺壟断組織和貴族地主的财产，将政权轉交苏維埃，同苏俄友好同盟。

列宁指出，在1918年，历史向德国提出了一个問題：是苏維埃政权还是資产阶級的国民会議？是无产

---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6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9頁。

③ 参看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 2, 1957, s. 386.

阶級的民主还是資产阶級的民主？①

在斯巴达克派和左派激进党人的影响下，德国一些城市和一些邦里的工兵苏維埃实施了一些摧毁旧国家机构的措施。汉堡工兵苏維埃解散了参議会、市議会并宣布掌管全部政权。不来梅苏維埃清除出軍官和資产阶級分子，成立工人赤卫队。不倫瑞克苏維埃控制了全部机构，撤去軍事机关、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領导官吏的职务。

但是，在大多数的苏維埃里，領导权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所据有。他們束縛工人的革命主动性，并力謀把无产阶級战斗机关的苏維埃，先变为維持“安宁和秩序”的机关，然后再消灭它。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領袖影响下的工人，不了解苏維埃的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一貫培育資产阶級議会制幻想的社会民主党領导对群众的長期影响，使大多数的苏維埃没有把政权問題当作革命的根本問題②。

11月10日，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拥护者的柏林工兵代表苏維埃全体会議，批准了人民全权代表的苏維埃的政府名单。其中包括右派社会民主党代表三名（艾伯特、謝德曼、兰斯堡）和独立派代表三名（哈阿兹、季特曼、巴尔特）。被选入柏林苏維埃执委会的人也多半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派人。工人和士兵坚持在政府成員中列入卡尔·李卜克內西。斯巴达克派的領袖要求以建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同意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这个要求被社会民主党的首脑們拒絕了，因此，李卜克內西没有加入政府。

自称“社会主义”以欺騙群众的艾伯特政府，其实是資产阶級政治家的工具。它力謀阻遏革命的深化，巩固剝削者阶級已被撼动的陣地，千方百計地削弱和破坏苏維埃。

政府的政綱規定实行一些不触动資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改革。压迫者原来的国家机构原封保持下来。皇朝的大臣們和帝国机构的領导人們，仍受令繼續处理政务。政府禁止实行土地改革。壟断組織的财产没有被侵犯。战争罪犯們都逍遙法外。艾伯特同帝国的总参謀部訂立反革命的密約。从白卫軍官中編制了志愿部队。政府专电最高統帅部，命令士兵絕对服从長官，士兵苏維埃要“加意保持軍官和士兵之間的信任心理”并要防止“混乱和叛乱現象”。政府还应軍閥們的要求，采取措施收繳工人的武器。

还在11月間，各資产阶級和貴族地主党派的活动就在新的名称（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它）下，活跃了起来。它們都是由于仇恨革命而联合在一起的，都要求最迅速地召开国民会議，都申言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因为他們把它看作自己的“救生錨”。对此，列宁写道：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塗上一层共和的色彩，但仍然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③。

“人民全权代表”的政府采取召集国民会議的方針。社会民主党利用精心制造的欺騙宣传哄騙工人，似乎在“合法范围”內通过国民会議，毋需工人阶級夺取政权，也毋需消灭資产阶級和地主的所有制，就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把苏維埃制度同国民会議“統一起来”的口号，支持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用社会化的欺騙宣传来掩飾其反革命政策。于是，以考茨基为首的、除社会民主党人外还高坐着壟断組織代表的“社会化委員会”建立了起来。这个委員会的工作頗具“成效”，以致于一个資本家的财产也没有被没收。改良主义职工会的首領在以生产“社会化”的諾言欺騙工人的时候，还帮助資产阶級巩固他們的陣地。1918年11月15日，职工会同盟总委員会的主席同壟断資本家斯丁納斯的代表締結了“业务合作”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一切經济問題和社会政治問題都应根据企业主和工人阶級合作的原則解决之。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領袖在外交政策上也叛卖了革命。德国工人阶級同情苏俄，要求恢复同它的外交关系。年青的苏維埃国家則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德国工人的斗爭。它曾經运送給德国两列車粮食。但这些粮食却不为革命叛徒們所接受。他們拒絕同苏維埃共和国建立联系，并与协約国一道进行反革命的反苏斗爭。按照1918年11月11日协約国同德國之間的休战条款，德国承担义务，在协約国軍未抵达前，不撤走自己在苏俄的軍队。德国还組織白卫志愿兵团和援助烏克兰、沿波罗的海区和苏維埃国家其它部分的白卫匪帮。因此，列宁写道：“德国在被打敗以前就經常帮助协約国，就豢养着克拉斯諾夫，直到最近它还在封鎖我們，直接协助我們的敌人。”④美国和协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贊助社会民主党政府扼杀革命的愿望。社会民主党在向美国乞求粮食的时候，对此种援助承担了保証“社会秩序与社会安宁”（也就是鎮压革命）的义务。因此，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領和“独立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9頁。

② B.烏布利希：“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影响”，載“近代史和現代史”1957年第5期，第11頁。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俄文版，第134頁。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5頁。

派”領导人的政策，无論內政方面还是外交方面，都在束縛和破坏工人阶級的力量，都在巩固反革命的陣地。

1918年11月下半月和12月的德国，充滿了激烈的阶級冲突。工人对日益囂張的反革命予以反击。在德国很多工业中心——上西里西亚的煤矿中，柏林的机器制造厂和其它企业中，魯尔的采矿場和冶金工厂中——都爆发了經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按照“斯巴达克”的号召，柏林和其它一些城市在保卫和継續加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地区的苏維埃不服从帝国政府的管轄，实行了一些革命措施。例如，慕尔海姆的工兵苏維埃(魯尔区)在12月初逮捕了包括壟斷資本家斯丁納斯和蒂森在內的九个反动分子；貝列堡的苏維埃沒收了“普里格尼斯”鉄路公司的財产，将經理、付經理和其它領导人員免职；米斯罗維茲（卡托維茲附近）的苏維埃撤銷了矿長的职务，讓工人来領导企业；萊尼柏多尔夫(柏林)的苏維埃在11月中旬解除了宪兵的武装；下萊茵省工兵代表苏維埃的代表会議抗議“人民全权代表”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并堅决拒絕召集国民会議的計划，把它看作“从革命中拯救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計划”。

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劳动农民爭取土地和消灭地主半封建特权的斗爭开展了起来。在西里西亚、汉諾威、巴登、巴伐利亚、符騰堡和其它地区里，出現了农民苏維埃。农民苏維埃提出了沒收和分配大貴族地主的領地的問題。农业工人进行了爭取經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爭。建立工农統一战綫的前提业已具备。但这个可能由于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和不懂得工人阶級与劳动农民必須联盟的左派所持之錯誤立場，竟未被利用。

資产阶級分子抗議和抱怨苏維埃破坏私有权、封閉資产阶級报紙、扣押反动分子的电报、信函、声明、从德国各个地区，寄送給“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对于这些事件，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都一一干預，捍卫資产阶級的利益。

在艾伯特政府的縱容下，反革命势力轉入公开进攻，发动反对工人阶級的国內战爭。12月6日，首都和其它一些城市都爆发了反革命的叛乱。叛乱分子在柏林槍击和平示威的工人和休假士兵，并試图逮捕苏維埃的成員，逮捕“斯巴达克团”的活动家和搗毁斯巴达克派的“紅旗报”編輯部。获得革命士兵和水兵支持的工人发动，肃清了叛乱。12月7日和8日，几十万工人按照“斯巴达克”的号召，在“打倒艾伯特—謝德曼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維埃”、“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下，举行了游行示威。斯巴达克派为了使革命深入而英勇斗爭，他們揭露了社会民主党首領的政策，但他們没有克服掉对自发性的崇拜，不善于在苏維埃中夺得巩固的陣地，他們同各省联系不强并継續同独立派同留在一个党內。由于没有革命的政党，社会民主党遂得以保持住对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的影响，并得以資产阶級議会制的幻想毒害工人的意識。

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柏林举行了第一次全德苏維埃代表大会，其中大多数代表都处于右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派”的影响下。大会的第一天，斯巴达克派組織了二十五万工人的游行示威，要求：宣布德国为統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解散“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将政权轉交苏維埃。代表大会不顧革命工人的意志，决議将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給“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会議的选举，并且通过一个含含糊糊的关于“社会化”的决議。被选入仅仅保留監督虛名的中央苏維埃的人，全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斯巴达克派的“紅旗报”总結会議的結果道：它“自縛手足，把人們信托給它的政权出卖給敌人了。”

这次会議的后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力求在国民会議选举以前击潰革命力量的反革命，实行了更加公开的进攻。12月23日至24日，政府試图解除駐防柏林、同革命工人有联系的“人民海軍师”的武装。但是，由于水兵們和奋起保卫他們的工人們堅决抵抗，这个企图失敗了。12月25日，柏林发生了浩大的工人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力图保持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和装着不同意艾伯特—謝德曼政策的独立派，在“流血事件”之后，退出政府。他們的职位被社会民主党人諾斯克和威塞尔所代替。

斯巴达克派根据革命經驗，日益得出必須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和单独建党的結論。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团”全德代表会議决定建立共产党。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爭取无产阶級专政、爭取建立統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綱①。代表大会发出給苏維埃国家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致敬函，其中写道：“意識到你們的心在因我們而激动，我們就有了斗爭的力量和斗爭的精神。”②可是，代表大会的决議中也

① 参看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 2, Berlin. 1957, s. 696—705.

② “Der erste Parteitag der Kommunischen Partei Deusschlands”, M, 1919, s. 20.

显示出斯巴达克派不理解党的工人阶級先鋒队的作用，不理解爭取工人阶級大多数和无产阶級同盟軍的必要性。代表大会錯誤地反对共产党人在改良主义的职工会里进行工作，錯誤地主張抵制国民会議的选举。党綱中規避了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少地农民和中农的問題，沒有談到打碎資产阶級旧国家机构的問題和准备武裝起义的必要性的問題。不过，党綱中虽有着这样的一些錯誤和缺点，共产党的成立毕竟是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它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轉折点。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断絕了，从而为德国无产阶級战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①。

1919年德国的阶級战斗　革命的結局和革命的意义

1919年初，德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国的阶級斗爭在1919年的冬天和春天异常地尖銳起来。西方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动陣营，力图消灭工人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成果和巩固資产阶級的秩序。大批的白卫組織就是反动陣营的急先鋒。

艾伯特政府瘋狂反对共产党人及其領袖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将志愿兵团集中柏林，准备用强力来粉碎革命运动。1919年1月，柏林展开了武裝斗爭。为了回答免去在工人中享有声誉的柏林警察总监左派“独立派”人埃赫戈倫的职务的挑衅行为，十五万工人和士兵于1月5日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时成立的、大多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有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皮克参加的革命委員会，号召工人起来武裝斗爭，反对艾伯特—謝德曼政府，并宣布行使政权。1月6日，总罢工和工人反对反革命的巷战开始了。但是，加入革命委員会的“独立派”人，不但不去領导斗爭，反而同政府进行談判。于是，諾斯克匪帮开始屠杀工人。起义被残酷地鎮压下去。1月15日，白卫分子和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們杀害了德国无产阶級的領袖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反动暴行的消息引起了全国工人的哀悼和憤怒。对此，列宁写道：“簡直找不到言語来形容这些所謂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恥。”②

柏林的一月战斗得到德国全国的广泛响应。不来梅由于工人总罢工和武裝发动結果，于1月10日宣告成立苏維埃共和国，它一直存在到1919年的2月3日。萊茵—威斯特发利亚煤区的工人，在一、二月間为了煤矿业的社会化和政权归于苏維埃，进行了頑强的斗爭。魯尔在爆发同击政府迫害的总罢工的同时，还发生了革命工人和軍警的武裝冲突。中部德意志、南部德意志和沿海地区都被卷入爭取工业社会化、爭取工人監督生产、爭取承認苏維埃的工人运动的旋渦。1919年3月3日，柏林发生了継后轉变为工人武裝起义的总罢工。但是，德国各地工人发动得很零散，运动的开展沒有一个統一的計划。工人阶級缺乏战斗的統一，使得諾斯克反革命匪帮和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其它白卫团体，得以各个击破革命的力量。

1919年的革命运动在巴伐利亚达到最高潮。由于4月13日慕尼黑工人的武裝发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苏維埃共和国。共产党人叶克格里·列威萊領导的苏維埃，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向苏俄致敬。列宁在回电中，列入了一个巴伐利亚苏維埃战斗的行动綱領③。巴伐利亚苏維埃政府創立紅軍，确立工人对企业的監督，开始实行工业与銀行的国有化，沒收資产阶級存儲的粮食并将其在劳动人民中进行分配，建立同反革命斗爭的非常委員会。但是，由于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够成熟，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犯了些大錯誤。苏維埃政府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沒有采取措施改善僱农、貧农和中农的境况。苏維埃政府不召集巴伐利亚的苏維埃代表大会，却去依靠受社会民主党和“独立派”影响的工厂委員会。“独立派”的上层人士妨碍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斗爭，并且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作出公开的叛卖行动，去同苏維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談判。5月1日，諾斯克和戈福曼的白卫部队冲入慕尼黑。三天巷战之后，工人的英勇反抗被打破。开始了白色恐怖。几百工人被慘杀，几千工人被投入監獄，巴伐利亚共产党的領导人叶克格里·列威萊被槍杀。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的复灭，結束了德国1918—1919年的革命时期。

如上所述，由于历史发展的結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在德国是已經成熟了的。

1918—1919年的阶級战斗表明，在革命中起过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德国无产阶級所力求的，不仅是实現未曾解决的、資产阶級民主的任务。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的工人阶級的先鋒队，进行了独立的、爭取无产阶級政权、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这个斗爭在1919年的头几个月里特別尖銳。革命在德国个別的地区里迈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可是它沒有胜利完成。

① Jahr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Berlin, 1955, s.10.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2頁。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俄文版，第298—299頁。

十一月革命就其結果而言，“没有超出实現資产阶級民主的要求”①。

壟断資本和貴族地主的根基未被触动。“資产阶級民主形式的資产阶級专制代替了半立宪的君主专制。”②这一点为1919年7月国民会議通过的魏瑪宪法所固定下来。无产阶級缺乏革命政党是十一月革命未能消灭德国壟断資本統治的主要原因。1918—1919年德国无产阶級的失敗，咎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領和左派独立派人的身上，他們用自己的政策分裂了和渙散了工人阶級，并依靠着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拯救了資产阶級的政权。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失敗了，但他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由于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斗爭，半专制的君主制度被推翻，資产阶級的民主制被确立，劳动人民夺得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在革命的火焰中，德国共产党創立了起来。德国革命是德国工人对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的积极援助，它使苏維埃共和国有可能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約和进行爭取立陶宛、拉脫維亞、爱沙利亞、白俄罗斯、烏克兰和外高加索从德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公开斗爭。

德国的工人阶級和全体进步力量将要在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陣营的工农国家在德国东部日益巩固和日益成長的条件下紀念十一月革命的四十年。由德意志統一社会党領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成就中，正体現着工人阶級先鋒队在1918—1919年英勇斗爭所爭取的理想和目标。

（蔡子宇譯自苏联“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

① В.烏布利希：“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載“近代史和現代史”1957年第5期，第11頁。

② 同上

“明治維新”前日本社会各阶級的分析

韓承文　伊文成

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实質上是一次資产阶級革命，它是日本社会內部生产力发展、資本主义因素成長的結果。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业已腐朽，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經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日本封建經济的解体。日本有淪为半殖民地的危險以及人民群众反封建的强大起义，促使日本資产阶級与反幕封建貴族結成联盟，利用日本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的政权，在日本建立了以封建君主为首的地主和大資产阶級联盟的国家。这个新国家从它建立那天起，便实行了一系列的資产阶級性質的改革，为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从而使日本由封建的社会經济形态过渡到資本主义的社会經济形态，封建制度为資本主义制度所代替，列宁認为“这个国家是資产阶級国家”①。

但是，1868年的日本革命是很不彻底的。新政权在推行資产阶級性質改革的同时，在政体上保留了带有封建性質的专制主义——天皇制度；資产阶級并没有直接执政，只是間接地通过資产阶級化的武士在政府中反映他們的利益，封建貴族在政府中拥有很大势力和影响；在农村中保留了大量的前資本主义的剝削形态。

1868年的日本資产阶級革命为什么不彻底呢？日本資产阶級为什么没有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建立联盟而单独地負起革命的領导任务呢？屬于封建統治阶級的“外样大名”和下級武士为什么也参加了資产阶級革命呢？本文試图結合日本的历史特点，对“明治維新”前日本社会各阶級的經济地位、特点、政治态度、相互关系作一些探討和研究。

一

从十七世紀初到1868年革命前夕，日本一直处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統治之下，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馬克思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日本时写道：“日本有純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頗为发达的小农經济。所以，比我們全部的大多数在資产阶級偏見下写成的历史书，它为欧洲中世紀提供了一个更忠实可靠得多的描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俄文版，第430頁。

写”①。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日本封建主义的經济基础。其主要的占有形式为：德川将軍領地、“大名”領地、寺院神社領地。而操縱国家政权的德川将軍是日本最大的封建主。十七世紀初年，日本全国共分为68个“国”，在47个“国”中均有将軍的領地，其余的領地则是属于“大名”的。不仅如此，将軍还直轄江戶、大阪、京都、靜岡等重要城市，并直接經营佐渡、伊豆、飞騨、但馬的金山、生野等銀山、足尾等銅山。如果按着当时农民收获的米来計算，幕府的收入約为700万石（一日石合为160公斤），占全国米产量的25.8％。各个“藩”国“大名”的收入最少的每年是一万石、最多的（如加賀藩的前田氏）为一百一十九万五千石。全部“大名”的收入共占全国米产量的72.5％。寺院神社領地約占全国土地的1.2％。

占德川时代日本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沒有土地的。他們是以庶民的身分依附于各級封建領主，按“永久租佃权”来使用土地，給封建領主繳納地租和服劳役。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叶时，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仍然是建基在封建生产关系上面的，主要的被剝削阶級农奴和剝削阶級封建主，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但是，从十七世紀初年开始，日本的封建經济日趋衰落和瓦解。究其原因，第一，伴随着商品貨币經济的发展，商人的势力更加深入到日本农村中来，他們得到封建主的允許到农村投資开发荒地，并且收購农作物和手工业品。当时，一部分富裕的农村上层分子也参予了商业活动。商人和农村中的豪富分子不仅向农民收購产品，而且逐漸干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逐漸成为农民的“包买主”。他們和农民訂立合同，把原料、預付金等事先貸給农民，条件是这些农民要按照“包买主”的要求进行生产，制成品要全部卖給他們。随着商品經济势力的侵入农村，此时，不仅城市里捐稅多用貨币繳納，即使农村中繳納的租稅也多半采用了貨币与实物混合的形式。貨币的需要加重了农民对高利貸資本的依附，借債通常以“永久租佃”的土地为抵押。当农民无力償还債务时，就失去了这块土地（“永久租佃”的农民，即近代日本的自耕农，他們所租佃的土地有权作为債务抵押）；于是，一些商人和高利貸者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即农村中的新地主。因而就破坏了德川幕府1643年所頒布的“永远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二，随着商品經济的发展，封建貴族們的奢侈生活使他們越来越穷困，所欠的高利貸也越来越重。为了維持奢侈的生活和支付高利貸的利息，封建主們只有加强对农民的剝削。結果使农民紛紛破产，仅在1785—1786年的一年間就有140万破产的农民逃出了农村，流入城市。所以，从十八世紀中叶以后，脫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人数愈来愈多，沒有丧失土地的小农也处于貧困和飢餓的边緣。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頗为发达的小农經济。

从十八世紀初年开始，日本資本主义工商业在封建經济的母胎內逐漸地发展起来。工业方面：在許多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形式的工匠手工业逐漸消失，出現了資本主义类型的手工工場，这是德川时代日本經济中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标志。由于农民流入城市、手工业者的破产和“浪人”的貧民化，城市中就聚集了大批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們。因此，就給資本主义类型手工业工場的出現創造了条件。从前日本的生絲需要靠从中国輸入，但到十八世紀后期，国內生絲即能自給。十九世紀中叶，当欧美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打开閉关自守的日本大門时，日本已变为大量輸出生絲的輸出国了。其他如棉織、造紙、染料、釀酒、榨油等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再加上欧美的工业机器源源不断地輸入日本，因此，使日本各藩境內資本主义的手工工場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特别在西南部各藩境內的資本主义手工工場发展得尤为迅速。１８３７年水戶藩建立了制炮場；１８４２年佐賀藩建立了荷兰式的鑄炮工場，１８５０年建立了反射爐，１８５２年薩摩藩建立了制造化学藥品和金属的工場，1853年建立了冶鉄、鑽探和玻璃的工場，１８５５年成立了科学館和造船場。此外，还有絲織业和紡織业工場，在各地也普遍地发展起来。商业方面：十八世紀以后，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各地区間的分工导致全日本“民族”市場的建立。农民的自給自足經济在市場的影响下已經趋于崩潰，并强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与生产資料分离，給資本的原始积累和資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市場上的大宗商品是：棉織品、絲織品、生絲、棉、染料等等。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場的扩大，国內出现了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当时大阪成为九州、四国、北陆②等地的商品集散地，江戶是关东③中部地方④、奥羽⑤等地商品集散地。伴随着市場的扩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06頁。

② 北陆包括現在的新瀉、富士、石川、福井四县。

③ 关东包括現在的神奈川、千叶、琦玉、群馬、枥木、茨城等六县。

④ 中部地方介于关东近畿之間的地区。

⑤ 奥羽包括現在的青森、岩手、宮城、秋田、山形、福島六县。

大，投机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江戶、大阪和京都等地出現了专卖商人，他們組成"会社"壟断专卖的商品发財致富，因而成为財力雄厚的商业資产阶級。

由于商业的发展，金融业也随之兴隆起来。当时，日本錢庄的經营近似現代的銀行业务。金融資本家大多数是商人出身，日本大财閥三井的祖先，就是由綢緞业轉行开錢庄的。

由此可見，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封建經济日趋瓦解，資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德川幕府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縛。因为，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济限制了农民扩大再生产，不能提供充足的工业原料；日本农民負担着日益繁重的封建租税和受高利貸的盘利，購买力非常低下，自然会影响到工业品市場的扩大；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和迁移自由，自然就阻碍了工业劳动力的来源。封建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合于日本封建社会內部孕育成長起来的那些新的生产力了，它已經成为資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資本主义与封建专制制度間的矛盾日趋尖銳，德川幕府已經无力抵抗自然經济的解体，强藩的兴起及反幕活动的加强，漸漸地威胁着幕府的統治，資产阶級革命的前提条件日漸成熟。欧美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速了日本資产阶級革命的爆发。

二

日本的封建經济及其发展趋势决定了日本各阶級的經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

在德川幕府統治的时代，日本全国居民被严格地划分为四个等級，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武士等級是封建統治的等級，天皇、将軍、"大名"是这个等級的上层分子，他們形成为日本的封建統治阶級，被統治的阶級是占人口８０％以上的农民、資产阶級（一般商人和手工工場主）和城市貧民。

天皇在名义是日本封建专制政体的最高統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仅仅掌握一些宗教典礼的职务而已。独攬大权的德川将軍对天皇的监視是很严格的，規定天皇不得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有任何接触。为此将軍特意在京都設置了"所司代"①。

德川将軍是日本最有实权的統治者。他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經济和軍事等大权。

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約有２５０——３００个，多数"大名"是直接依附于幕府将軍，少数"大名"是較为独立的封建領主。"大名"在自己的"藩"中是全权的主人，掌握着司法权，对农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然而，"大名"本身要受将軍的控制，当"大名"因不服从将軍而被控告时，将軍即可以"治理不善"为借口，剝夺其权势，或使用其他的懲罰方法，直到灭族为止。

"大名"之間的政治地位并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三种：（１）"亲藩大名"，德川氏的一族，可从中推选将軍的継承人；（２）"譜代大名"，是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担任重要官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３）"外様大名"，他們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諸侯，轉而支持德川氏者，其实力远較譜代大名为富足。他們之所以承認将軍的权力，也只是因为将軍在軍事上和經济上占优势。"外様大名"仅在自己的藩內握有实权，在幕府里并不担任职务。他們远离中央，保持着封建割剧的独立性。"外様大名"以西南部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的势力最为强大。德将軍不信任"外様大名"，曾采用了各种手段来防范和控制他們。将軍特意把"亲藩大名"和"譜代大名"的封地配置在"外様大名"的周围，以便监視、控制他們。此外，还实行了"参覲交代"②制度，来削弱"外様大名"的政治和經济势力。因此，在"外様大名"和德川幕府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成为"外様大名"后来参加反幕府斗爭的原因之一。但是"外様大名"参加反幕斗爭的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在資本主义因素发展过程中，他們之中頗大一部分自由化了，从而与新的生产方式——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了起来，并成为它的政治上的代言人。

"外様大名"为了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为了充实軍事力量和經济力量来对抗德川将軍，为了鎮压农民起义，因而建立了一些生产武器的資本主义的手工工場。如前所述，从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間，薩摩、土佐、長州、肥前等藩主設立了兵工厂、鑄炮厂、制槍厂、造船厂以及火藥制造所等。因此，一些"外様大名"一方面是封建諸侯，另一方面又是手工工場主，残酷地剝削手工业工人。这些"外様大名"已經成为資产阶級化的封建貴族了。他們为发展其所經营的手工工場，因而极力反对德川幕府对自己的控制和干涉，要求扩大貿易范围，实行"幕政改革"，

武士等級无論在經济上或政治都不是完全一样

---

① "所司代"即幕府在京都的将官兼地方行政長官，他負有監視皇帝室的責任，不許天皇与外界接触。

② "参覲交代"制是德川幕府时代，"大名"每隔一年必須由自己領地到江戶謁見将軍的一种制度。"大名"帶着家屬和随从人員住在幕府附近，参加法定的奢侈豪華的仪式。"大名"在江戶住一年之后，回到自己領地时，必須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戶，作为人質。这种制度的实質是为了限制和削弱"大名"的政治經济势力。

的。除了上述的将軍、"大名"等上层分子外，还有特权武士和一般武士。特权武士"旗本"是将軍的直属家臣，是将軍主要支柱。他們仅次于"大名"的地位，大部分充任政府官吏，負責鎮压农民起义和貧民暴动。有的特权武士，直接管理将軍的領地，直接統治着农民。属于"大名"的基本武士群众称为一般武士（下級武士），是"大名"軍队的基本力量。他們沒有土地，从"大名"那里取得俸米。德川时代諸侯之間的战爭消弭了，一般武士除了鎮压农民起义外，无所事事。

随着商品經济的发展，封建貴族（大名）們的奢侈生活耗尽了他們的財富。为了維持奢侈生活及償付高利貸利息，封建貴族們（大名）除了加緊向农民和城市居民掠夺外，在封建統治阶級內部也采取了措施："大名"不再需要維持很多的武士，一部分下級武士被停止发給俸米，沒有被停止发給俸米的武士，俸米也常被减少。前者在經济上失去依靠变成了"浪人"①，生活困苦而不安定；后者减俸米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生活也很痛苦。下級武士生活的惡化，引起他們对封建制度的不滿，并与封建貴族們（大名）逐漸对立起来，以至"怨主如怨仇敌"②。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况和提高在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一般武士成为倒幕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生活日益惡化的武士，多数进城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作家、西方語言研究者和科学工作者。由于他們从事科学文化活动，吸收了欧美資产阶級的文化和思想，意識到落后的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因此，他們主張"維新"和变革，仿照西洋建立資产阶級的政治制度。成为資产阶級思想的传播者，倒幕运动的宣传者和鼓动者。

由此可見，在当时日本社会經济发展的情况下，在封建主阶級內部，逐漸分化出資产阶級化的一翼，特别是下层武士是如此。他們由于其長期所处的地位，較富于組織性，成为后来日本資产阶級革命的領导力量。自然，由于他們之阶級特質，也就不能不对未来資产阶級革命賦予保守性和极大程度的不徹底性。

此时，日本資产阶級是国內社会生活中正在成長着的新力量。資产阶級包括有商人和手工工場主，他們在德川幕府时期被列为最低賤的地位，在政治上、法律上得不到保障。当时政府对人民有一条"格杀勿論"的法律，商人也不例外。任何一个武士只要感到商人或手工业者中有誰对他稍有"不遜"时，即可公然杀害，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此外，資产阶級的經济活动也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禁止他們从事对外貿易，不允許載重超过五百石的大船远航，不許任意退出同业公会或經营新的企业。

但是，資产阶級的經济势力却保証自己的政治影响得以日益增長，在"鎖国政策"的束縛下和农民貧困的情况下，資产阶級是把将軍、"大名"和武士們看成是唯一的发財致富的对象。将軍、"大名"和武士們都力求把自己从农民那里得来的米穀和实物的一部分換取貨币。特别是由于实行"参覲交代"制度，"大名"需要的貨币更多，这就不得不将米穀和实物出卖給批发商人。因此，大阪收买米穀的商人就获得了发財致富的机会，同时也促进了貨币經济和商品的流通。馬克思写道："生产越是发展，貨币財产就越是集中在商人手中。"③資产阶級的財富积蓄得盈千累万。根据日本經济学家的統計，在十八世紀末期全国的財富大部分都集中在資产阶級的手里。1790年"如以日本国为十六分，則十五为商业的收入，其一为武家的收入"④。

資产阶級随着財富增多的同时，在他們当中形成了大資产阶級（主要从事大商业活动、金融高利貸活动等）和一般資产阶級（主要从事工場手工业和普通商业活动）。拥有大量財富的大資产阶級，多数是变成了将軍、"大名"和武士的債权人。日本年鑑記載，許多的"大名"都变成了日本五十个最富裕商人的欠債者。日本有句諺語："大阪豪一怒，而天下大名惧"⑤。他們构成日本資产阶級中最有力量的阶层。

由于大資产阶級在經济上与将軍、"大名"有着密切的来往，因而他們与将軍、"大名"进行了勾結，得到了将軍和"大名"的保护。同德川将軍有联系并支持幕府的大資产阶級称为"江戶派"，同"大名"有着密切联系的称为"大阪派"。

一般的資产阶級不仅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反而还受到德川幕府的干涉与限制。因此，一般的資产阶級都渴望获得"平等权利"及废除封建等級制度。伴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資产阶級的革命要求也就日益强烈了。但是，他們的实力較諸大資产阶級要遜色得多了。

---

① 脫离藩主后沒有主人、到处流浪的武士称为浪人。

② 本多利明：經济秘策（日本經济丛书）第十二卷，第72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3頁。

④ 野呂榮太郎："日本資本主义發展史"，五十年代出版社版，第49頁。

⑤ 伊豆公夫："日本历史讲話"，五十年代出版社版，第71頁。

日本资产产阶級的这一特点，使它的一端与大封建主，特别是自由化貴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不能，也不敢領导人民进行徹底的反封建斗爭；另一端則无力領导这一斗爭。因此，在后来革命中，資产阶級不敢与农民結成联盟，而是与自由化的貴族形成联盟并在其領导下进行了資产阶級革命。

日本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是受剝削最重和受压迫最深的阶級。德川时代的农民，无論是在幕府直接統治或在大名統治的地区，絕大多数都是过着中世紀农奴式的生活。幕府的法令規定：农民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买卖土地、改变职业。

日本封建主对农民的統治和压榨是极为残酷的，德川时代初期統治和剝削农民的政策是："对于农民就是不要让他們死，也不要让他們活"①，这样才能保証农民"不死不活"地給封建主耕地和納貢。但到十八世紀末时，由于商品經济发展，封建主奢侈的生活使他們越来越穷困，封建主为了满足自己的奢慾，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于是，使农民的生活狀况更加悪化了。

德川时代，农民除繳納沉重的地租和賦稅外，还要給領主去服各样的劳役：修补房屋，建筑堤坝、修桥补路等。不仅如此，农民的生活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德川幕府不断地頒布所謂"劝农节儉"的法令，实际上是保障剝削农民的措施。德川幕府規定："普通百姓除棉布麻布以外，不得穿其他衣料；妻室子女亦应如此。关于食物之事，均应經常严格遵守：修身治家，积聚家产，不可稍涉奢侈。"② 幕府甚至規定：农民不許飲酒喝茶；不許互相訪問和聚餐③。可見，日本农民是过着犬馬不如的生活，被迫将一点一滴血汗的果实都用去充当年貢。

为了防止农民暴动，德川幕府实行了"五人組制度"④，即由五戶人家組成一个行政的和稅收的单位，負連帶責任。农民不能自由离开农村，如有人离开則被認为是"逃犯"，要受到法律的懲罰。这种以連环保为約束的"五人組制度"，加强了日本农民的农奴依附地位，其目的是使封建主可以順利地剝削农民。

农民受高利貸的盘剝也是很严重的。随着貨币地租的发展，多数农民都变成了高利貸者的債务人。农民为了償还債务，有的失去了"永久租佃"的土地，有的傾家蕩产。

由于封建領主残酷的剝削，高利貸資本的盘剝，再加上地震等天灾，所以日本經常发生飢荒。在德川幕府整个时代，发生大灾荒的有130次，大飢饉的有21次。貧困和破产使得农民越来越走上反抗封建統治的道路，所以农民起义是連年蜂起的。从德川幕府建立的1603年起，到1867年为止的265年当中，农民起义共达1,240次之多。十九世紀以来的农民起义显得特别頻繁和激烈，規模也愈来愈大。仅在1803——1867年的六十余年当中，农民起义即达484次。1818年的起义，参加者即达13万人之多。日本农民持續性的斗爭，表現了它的作为反封建斗爭的主力軍的作用。

当时，日本农民阶級的政治要求是集中在土地和人身自由这两个主要問題上。这种要求虽然帶有資产阶級民主的性質，但是由于日本資产阶級的軟弱性和妥协性，沒有接受这种要求，沒有和广大的农民結成联盟。因之，日本农民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参加資产阶級革命的，并成为1867——1868年資产阶級革命的主要动力。

与农民起义同样有力地打击幕府制度的还有城市平民的暴动。城市平民阶层包括有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无产者。到十九世紀中叶，手工业者等級的阶級分化已經相当显著了。行会的行东（"亲方"）是剝削者，他們和作为被剝削者的帮工（"职人"）和学徒（"徒弟"）是对立的。

随着商品經济的发展，幕府对城市平民的剝削也加强了。幕府的官吏和大商人壟断粮食，囤积居奇，物价騰貴的負担自然落在城市平民的头上。特别是当发生歉收和自然灾害的时候，城市平民簡直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平民时常发动反对政府、豪富、大商人和高利貸者的斗爭。自1786年起，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貧民袭击粮商的事件。

1837年在下級武士大盐平八郎的領导下，大阪也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批发商人进行投机活动造成米价的猛漲所引起的。起义之前，大盐平八郎向大阪附近各农村中传发檄文⑤，呼吁农民参加起义，

---

① 德川实記，第一編，第354頁。

② "地方落穗集"見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頁。

③ 参見"庆安告諭"見上书，第34頁。

④ 德川幕府統治时期，在各地农村与市鎮中，近鄰五戶的戶長編成一組，称五人組。每組各有記事簿一本，載明上級通知的事項，以及組內应守的紀律。德川时期的五人組制度，沒有全国性的詳細法令；但这种制度，普遍存在于幕府的直屬領地以及各地封建領主的領地內。五人組制度是封建主压榨农民的基層組織。

⑤ 参見"大鹽平八郎檄文"。見世界資料丛刊初集，"1600——1914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52頁。

打倒現存的暴政。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来得及与四乡农民結合，仅仅两天即被大阪官軍鎮压下去，但类似的城市平民的暴动却很快地在日本的其他城市蔓延开来，因而更加深了德川幕府的政治危机。

城市貧民虽然构成为反封建斗爭的主力，但是，它还不是一个統一的阶級力量，一方面手工业者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他方面，作为近代无产阶級前身的城市无产者还未形成近代工业无产阶級，因此还没有能力来領导未来的革命斗爭。

与此同时，封建統治阶級陣营內部的斗爭，也在逐年增强，怀有反幕情緒的資产阶級化了的“外样大名”，在要求恢复天皇政权的旗帜下进行着倒幕活动。

所有这一切証明，十九世紀上半期日本社会的阶級矛盾日益尖銳化。年复一年地愈趋强大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貧民起义，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德川幕府統治的崩潰。

在日本国內革命形势逐漸成熟的情况下，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更加促使日本社会的阶級斗爭日益尖銳化。

三

十九世紀中业，美、英、法、俄等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相継侵入日本之后，迫使德川幕府締結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約。这样，就更加引起了国內广泛社会阶层对德川政权的不滿、憤怒和反对。因为，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日本，首先損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从日本和外国侵略者簽訂了不平等条約之后，日本的入口稅急剧地下降至5％，从而使欧美的廉价商品象潮水般地湧入日本，原料大量外运，黃金外溢，物价上漲。1859——1870年米价上漲了四倍，棉織品价格上漲了三——四倍，1860——1861年間出口貨价格上漲了三倍。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大名”和武士們的奢侈慾望增大了。他們为了購买各种商品，便增加租稅，橫征暴歛。这样，使遭受双重压迫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生活狀况更加惡化了。这些陷于飢餓和死亡边緣的人民群众对德川政权的仇恨尤其加深了，因而就引起了1860——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平民起义的强大浪潮。此外，外国人在日本的粗暴、野蛮行为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憤怒。于是在日本国內掀起了“攘夷倒幕”运动。1862年在江戶发生了焚燬英国公使館、杀死英国人理查尔遜的事件，1863年在江戶发生了焚燬美国領事館的事件。日本国內的政治斗爭越来越复杂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完全陷于瓦解，革命終于爆发了。

蒙受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略之害的日本資产阶級，虽然意識到这是由于德川政权的投降政策的后果，但是軟弱无力的資产阶級并没有出头領导这次革命。这时，以西南部四藩：長州、薩摩、土佐、肥前为首的“外样大名”利用人民群众革命高漲的局面，乘机出头反对德川将軍，結成了軍事同盟。他們在資产阶級的支持下，于1867年11月对德川幕府展开了軍事进攻。1868年1月在伏見和鳥羽之役中，击潰了德川庆喜的軍队，树立起以天皇为首的地主和大資产阶級集团的政权。

从日本資产阶級革命前夕各个倒幕阶級的要求和政治态度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势力：第一种是革命的农民和城市貧民。当时农民堅决反对封建奴役，要求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城市貧民要求“四民”平等和稳定粮价。所以，农民和城市貧民的起义成为这次革命的冲击力量，是这次革命的主要动力。虽然反幕軍事同盟的軍队和农民群众没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城市貧民起义，那末西南諸藩和資产阶級的联盟便不可能战胜德川将軍。換句話說，正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城市貧民起义才动摇了幕府的統治，促使幕府制度的垮台。但是，农民起义和城市貧民起义是带有自发的分散的性質，未能匯合成为巨大的力量，这主要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級，使得农民群众缺乏有力的革命領导，很难使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二种势力是新兴的軟弱无力的資产阶級。他們要求废除封建束縛和各种限制，俾得自由发展資本主义，同时要求提高政治地位。所以，資产阶級要求推翻德川将軍的統治，进行資产阶級革命。

但是，日本資产阶級并没有以革命領导者的資格同农民建立同盟（指与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相比），反而和“外样大名”以及武士結成联盟，完成了不彻底的資产阶級革命。其原因：第一，由于当时日本資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資产阶級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协性所致。因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不如欧美資本主义国家，日本在革命前夕缺乏象西欧那样的自由城市，缺乏象西欧那样的自由資产阶級，正是处于手工工場阶段，剛剛采用机器生产。資本主义經济力量的薄弱，使得資产阶級不能单独地負起革命的領导任务，所以不得不和有着武装力量的“外样大名”和武士們結成联盟；第二，在革命前夕，日本工业資产阶級的数量并不多，主要是商业、高利貸資产阶級，他們与封建势力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因为德川时代的封建割据性和政治經济上的种种限制，有些資产阶級不愿意将其資金投

于工商业，而是向农民放高利貸进行勒索，或者本身經营土地，直接用封建剝削方法来掠夺农民，成为“新地主”。另外，有的是封建貴族的高利貸主，有的受封建主的特权保护，壟断貿易，因之和封建主有着利害关系。农民的反封建斗爭，自然也威胁到这样的資产阶級。因此，他們目睹轟轟烈烈的农民暴动而战慄，为了維持和巩固对农民的剝削，必然要与“大名”和武士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农民起义；第三，資产阶級不仅是“大名”和武士們的債权人，同时，由于日本国内市場狹小，資产阶級还把封建主当作主要的顧客；經济上的紐带关系把两个阶級揑在一起，彼此相依为命；第四，政治上无权的資产阶級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向藩主献金来取得武士的身分；第五，“外样大名”和武士为了倒幕也希望得到資产阶級的經济上的支持，因为他們单凭軍事力量和政治声威，是不足以推翻幕府的，必須依靠資产阶級供給倒幕的軍費。如大阪的大商人三井家、鴻池家，在推翻幕府的战争时期和“維新”初年，就曾在財政上供献了很大的力量。資产阶級在財政上的支持，对于倒幕战争的胜利是有重要作用的。

綜合上述五点可以看出：資产阶級和“外样大名”以及武士們的关系是非常緊密的。資产阶級虽然没有直接領导革命，但資产阶級化的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却反映了它們的利益和要求。由于日本資产阶級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协性以及与封建关系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因而他們惧怕农民起义，不敢和农民結成强大的反封建的同盟，不敢領导农民进行徹底的革命。

第三种势力是反对德川幕府的“外样大名”和武士們。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国内阶級矛盾的尖銳化，封建貴族内部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倒幕的“外样大名”和上层武士原来就和德川将軍有着尖銳的矛盾，当幕府制度陷于危机和政治斗爭激烈时，他們主張先整頓內部，推倒幕府制度，而代之以另一个有利于他們的朝代。下級武士与他們的要求則大不相同，一部分下級武士在国内外資产阶級的影响下，已資产阶級化，宣传資产阶級思想；另一部分下級武士由于生活困难，积极要求废除幕府制度改善自己的政治、經济地位。“外样大名”和武士們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但它們在要求推翻幕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倒幕联盟結成的基础。因为日本資产阶級的軟弱性和妥协性，使得倒幕联盟的領导权落在和資产阶級接近的下級武士領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的手中。他們虽然代表和反映了資产阶級的利益，在革命成功后进行了一些資产阶級性质的改革；但象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都是出身于封建貴族，受下級武士推举和封建藩主的委托而参加中央政权的，因之，他們又反映了封建主的利益，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所以，使得1868年的日本革命成为一次未完成的不徹底的資产阶級革命。

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和对罗馬社会的影响

周庆基

公元前三世紀上半期至二世紀下半期，罗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諸国。这一百余年来的海外战争，对罗馬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及对罗馬的影响这两个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

对罗馬和被征服国家社会經济的发展与阶級关系的分析，是探討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基本原因的关鍵。現在先让我們从罗馬方面着手：

公元前四至三世紀，罗馬的奴隶制社会已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对早期的奴隶制社会而言）。奴隶的数目已較以前增多，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罗馬曾将大批战俘变为奴隶。奴隶劳动开始被使用于各个經济部門。公元前 357 年的关于釋放奴隶税法和公元前 326 年废除債务奴役的立法，都是奴隶制度发展

的証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奴隸制度的发展引起了經济的高漲，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发展起来，为罗馬的侵略提供了丰富的物質力量。

其次，从阶級关系方面来看，公元前三世紀罗馬奴隶制社会呈現着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二百年来平民和貴族的斗爭，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的实行，肅清了氏族制的殘余，暫时地緩和了自由民內部的矛盾，同时，罗馬虽然已进入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但是奴隶主和奴隶間的矛盾还未发展起来，当时还没有爆发大規模的奴隶起义便可以說明这点，这就使罗馬奴隶制社会获得暫时的稳定。因此，在局势危急的时候，奴隶主阶級敢于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与外敌斗爭，甚至釋放了一些奴隶，以加强罗馬的战斗力。阿庇安描写坎尼之役以后的罗馬情况道："元老院派奎因都司·法庇烏斯（即写了一部历史，記述这些事迹的那一位）到特尔菲的神托所去，就当前形势請求神諭。他們又征得了主人同意，釋放了八千奴隶，并命令城中每个人都动手制备武器和矢石。"①此外，构成罗馬軍团骨干的农民对战爭也抱着积极的态度，当时土地兼并尙未急剧展开，他們和大土地所有者奴隶主間的矛盾尙未尖銳，同时，他們也希冀在海外侵略中获得土地和战利品，而当汉尼拔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們又奋起保卫自已的田园和自由。

从以上所述，我們不难看出海外侵略胜利罗馬本身的因素。簡单說来：公元前三世紀，罗馬奴隶制經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为战爭提供了丰富的物力，同时，罗馬奴隶制社会当时处于暫时的稳定阶段，这一切都造成了罗馬軍事上的优势。

罗馬本身的因素只是它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的一方面，我們还要对被征服的国家进行分析，以寻求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的另一方面。

首先，讓我們来看一下罗馬的主要敌人迦太基。公元前三世紀，迦太基的幅員非常广大，其殖民地遍布于西部地中海。迦太基的奴隶数目很多，奴隶主驅使奴隶担任繁重的工作，并对之处以极其殘酷的刑罰。臣属于迦太基的各族人民的境遇也非常悲慘，他們要負担苛重的捐稅和徭役，其数量甚至超过农民收入的一半。迦太基的政权掌握在富有的奴隶主手中，形成寡头政治，并且腐敗不堪，卖买官爵之风甚盛。亞里斯多德曾經写道："今覌迦太基之政制，意在得閒暇之人，以任国政，故不能不注意于被选者之財产方面；……弟末流所趋，馴至其国之最高要职，如君主与元帥之人选，亦可以代价購而得之，此則不能不謂其国之一大秕政矣。"②因此，在迦太基社会內部充滿着尖銳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間的矛盾、貧民与富有者間的矛盾以及被征服者与迦太基人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公元前２４１—238年成分复杂的起义便說明了这点。此外，奴隶主阶級內部也存在着爭权夺利的斗爭，例如，長期在意大利作战的汉尼拔却得不到迦太基本国政府的援助。阿庇安記載汉尼拔請求援助而遭到拒絕的情况道："但是那些对他（指汉尼拔——本文作者）的一切行动都加以嘲笑的敌党，現在也回答他說：他們弄不懂旣然汉尼拔自已說在打胜仗，怎么还要乞援，向来战胜的將軍是只会把錢送到本国来給自己人，不会再要錢的。迦太基人依从了他們的建議，旣不送軍队来，也不送錢来。"③由此可見，尖銳的社会矛盾使迦太基成为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这是罗馬战胜的原因的另一方面。

然而，第三次布匿战爭迦太基的失敗却不能用以上的因素来解釋。第三次布匿战爭的性質已經轉化了，对迦太基而言，它是抵抗侵略的正义的战爭，迦太基人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社会內部的矛盾緩和下来了，一致奋起对外，致使罗馬大軍費了两年多时間才攻陷迦太基城。这一次迦太基的失敗，主要是它的軍力和罗馬的軍力相差太悬殊。恩格斯講第三次布匿战爭是"实力强过十倍的对手对軟弱无力的对手的粗暴的压迫"④。

現在，讓我們再来分析一下被罗馬征服和打敗的东方国家。由于亞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希腊城邦丧失了广大的东方市場，东西方的貿易掌握在埃及托勒密王国手中，希腊城邦的經济狀况日益惡化，阶級斗爭也日趋尖銳。普卢塔克描写公元前三世紀斯巴达的社会情况道："富有者排斥了合法的繼承人，毫不迟延地將財产攫取到他們的手中，所有的財富皆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都陷于貧困和悲慘的境地。全国充滿了骯髒的勾当，对富有者的仇恨高漲。"⑤阿基斯、克利奧曼尼斯和那比斯的改革便是斯巴达貧富間矛盾的表現。雅典和其他的城邦情况也不比斯巴达好些。总之，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

---

① "罗馬史"，第七卷。轉引自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罗馬共和国时期"（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95頁。

② "政治論"，第二編，第十一章，吳頌皋等譯，商务印书館1934年版，第103頁。

③ "罗馬史"，第七卷。轉引自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罗馬共和国时期"（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8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俄文版，第434頁。

⑤ "名人傳"，阿基斯傳，英譯本，第三卷，每人丛书，1921年，第86頁。

和貧民与富有者的矛盾在希腊已达到非常尖銳的地步。希腊的奴隶主为了鎮压劳苦大众，竟不惜卖身投靠罗馬，便利了罗馬的征服。

公元前三至二世紀，希腊城邦的宗主国馬其頓王国除去奴隶制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銳以外，更具有另一个弱点，就是希腊人民对它的反抗。虽然由于希腊奴隶主阶級的决心不够，埃陀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未能将希腊从馬其頓的羈絆下解放出来，但是多多少少也打击了馬其頓的力量。至于塞流西王国，它本身就是不巩固的，正是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暫时的不巩固的軍事行政的联合"，"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①同时，長期与其他"希腊化"国家进行战争，也削弱了它的軍事力量。因此，罗馬没有費去很多的气力，就征服了馬其頓和打败了希腊。

从以上所述，我們也就可以看出罗馬海外侵略胜利的客观上的因素。也就是被罗馬征服和打败的国家奴隶制經济的衰落和內部的尖銳的社会斗爭，决定了它們屈服于罗馬軍团的利劍之下。

最后，我們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結論：当时罗馬奴隶制經济的繁荣和奴隶制社会暫时的稳定与被征服或打败国家奴隶制經济的衰落和奴隶制社会內部矛盾的尖銳結合起来，构成了罗馬海外侵略的基本原因。此外，罗馬士兵的成分——公民兵、优良的战斗組織和拆散敌人联盟的巧妙的外交手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海外侵略对罗馬社会的影响

公元前三至二世紀罗馬的海外侵略，对罗馬社会发展的影响甚为巨大，它促进了罗馬奴隶制的发展，使其臻于繁荣之境，罗馬奴隶制社会也从而丧失其暫时的稳定性，阶級矛盾趋于尖銳。

罗馬奴隶制度的发展是奴隶制度发展規律本身所决定的，但是海外侵略却对之有着很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說明：

首先，海外侵略的結果，使罗馬在地中海上建立了霸权，壟断了地中海的商业，意大利商人、高利貸者遍于地中海沿岸各地，第洛斯島、巴尔干半島、小亞細亞和高卢等地皆有他們的足迹。商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对奴隶的需要。

其次，海外侵略为罗馬提供了丰富的奴隶来源，例如，第三次馬其頓战争結束后，罗馬曾对支持馬其頓的伊庇魯斯的七十个城市实行报复，将当地十五万居民变为奴隶。

由此可見，海外侵略一方面增强了对奴隶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提供丰富的奴隶来源，奴隶制度乃进一步地发展起来，奴隶劳动被广泛地使用于各个生产部門，构成了罗馬社会的基础。

罗馬奴隶制度的发展必然引起奴隶制社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同时，海外侵略本身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三世紀，罗馬自由民間的矛盾曾一度緩和下来，而海外侵略促使这一矛盾趋于尖銳。第一，海外侵略加速了罗馬大土地所有制增長的过程。長期的战爭促使小农破产，土地兼并盛行。阿庇安描写当时的情况道："富人占領了大部分公有地之后，即开始将邻近貧民的地区归并于自己領地之內，一部分用錢买，一部分用力夺。"②此外，被征服的土地的大部分也都落到大土地所有者——豪門貴族的手中；第二，海外侵略又使得一部分人——騎士暴富起来，他們中間包括包稅人、包工者、商人和高利貸者。普卢塔克描写較晚的罗馬富豪之一革拉苏的财富和致富的原因道："……最初他的财产不超过三百塔兰特，………当他出征帕提亞以前，他发現他的财产竟达七千一百塔兰特，如果我們說出眞实情况，会使他丟臉的，他的大部分财产是靠火灾和暴力得来的，利用大众的灾难从中漁利。"③这一切都使得罗馬自由民內部的矛盾趋于尖銳，貧民和富有的斗爭、奴隶主內部（豪門貴族和騎士間）的斗爭开始激烈起来。

公元前三世紀，罗馬奴隶主与奴隶間的矛盾尙未发展，而海外侵略又促使这一矛盾尖銳化。海外侵略为罗馬提供了大批的奴隶，奴隶数目增多和奴隶制的发展，使得奴隶主对奴隶的剝削加强，大規模的奴隶起义乃接二連三地爆发起来。

总言之，海外侵略促进了罗馬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奴隶制的发展必然引起罗馬奴隶制社会內部矛盾的尖銳，而海外侵略本身也直接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尖銳化。在海外侵略以后，罗馬社会的情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富人和穷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們彼此間的殘酷阶級斗爭，——这就是奴隶制度底情景。"④瞭解了这点，就不难說明以后的罗馬大規模奴隶起义和广大的民主运动的社会背景。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頁。

② 轉引自狄雅可夫等："古代世界史"，中譯本，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教材科，1953—54年。

③ "名人傳"，革拉苏傳，英譯本，第二卷，每人丛书，1921年，第273頁。

④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57頁。

資料 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及其实施情况

郭存孝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巨大、波瀾壯闊的一次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曾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在制定推行它的軍事政治制度时也針对当时泛濫充斥于中国社会的鴉片毒品制定了严厉的禁烟政策（太平天国称鴉片为洋烟，本文所說是指禁鴉片問題），并加以認眞的执行。

在太平天国革命領袖洪秀全的第一部革命理論——"原道救世歌"里，就提出了禁烟問題，他說："炼食洋烟最顚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近代史資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第90頁）。这是太平天国革命領袖目击鴉片流毒提出禁烟的第一支革命号角。当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的領袖們就把禁烟問題提到政策上来实践了，他們深惡痛絕地指出"洋烟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鴉片为"妖魔惡习"，并且在革命的律例中明文規定"凡吹洋烟者，斬首不留"（"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31頁）。以后在整个革命斗爭过程中，都坚决不渝地加以貫彻执行。

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是从严令禁止吸食、販卖、种植，禁止外国侵略者輸入等方面着手的。

太平天国的禁烟是从严禁吸食开始的，在"天条书"中的第七条中即規定："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太平天国"第一册，第79頁），犯了十款天条中的任何一条均杀而不赦；在"太平条規里"也規定"要炼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太平天国"第一册，第155頁）；当太平軍向長江进軍的时候，又在軍事律令中具体規定"凡我們兄弟俱要修好炼正，不准吹洋烟……犯者斬首不留"（"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28頁）。

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使这块被鴉片籠罩的地区，移风易俗，又制定了比較完整全面的禁烟政策，当时太平軍所頒布的"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告示中即說："洋烟黄烟不可販卖吸食也，洋烟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葯，……倘有販卖者斬，吸食者斬，知情不稟者一体治罪"（"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25頁）。

太平天国对于禁烟政策的执行是非常認眞严肅的，从太平天国的史籍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懲治吸食烟犯的記載，如癸好三年十月十八日（1853年11月22日），在天京新桥拿获吸烟犯周亞九等三人后，就由东王楊秀清呈报天王，經天王批示，将周亞九等斬首不留（"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06頁）；1854年3月10日太平天国恩賞丞相陈桂堂的部下軍帅張沛澤偷食鴉片被檢举，經調查屬实即处以极刑。

太平天国在执行禁烟政策时是采取的宣传教育和懲治相結合的办法。为了給吸食烟犯者以自新悔改的机会，太平天国提出了寬大的限期戒烟的措施。在天王的詔书里就曾劝戒染上烟癮的人說："戒烟病死胜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91頁）。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即根据这种精神大力地实行了先宣传教育后懲办的措施。据張羽屏先生說："太平軍在揚州看到面色难看的，就查問是否吸洋烟，如回答不是，就看手指。如发現手指有黄色，随即关起来（但仍給伙食），过一二天后，精神复員了才放出来"（周邨："太平軍在揚州"，第45頁）。又据地主阶級文人張汝南在"金陵省难紀略"中說："犯吸洋烟者杀，后寬限令戒，限后一月內犯者枷三个礼拜；两月內犯者枷七个礼拜；三月內犯者杀"（"太平天国"第四册，第715頁）。正由于执行这种教育和懲办相結合的禁烟政策，因此太平天国在南京地区的禁烟成就是非常宏大的，連中外的反动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如：馬鶴船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禁烟酒"一詩中說"烟筒酒壺見即夺，縛献巡查法不宥"（"太平天国"第四册第734頁）；

英法侵略分子在窥探南京以后也說“仁宁城葺理完固……市井安恬……鴉片断絕”（見呂振羽：“史学研究論文集”第131頁）；1854年9月香港发行的英商报紙“遐尔貫珍”第九号上也载，“城中（天京）禁絕鴉片及生熟烟”。可見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是非常徹底而有成績的。

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不仅对內認眞执行貫徹，同时还針对外国侵略者宣布了鴉片貿易是非法的，并采取了严防鴉片輸入走私的措施。

1853年駐守鎮江的太平軍大将罗大綱就对英国公使文翰提出了禁止輸入鴉片的問題，并痛斥了英国販卖鴉片的可恥行为。

1854年6月25日东王楊秀清命翼王石达开、卫天侯黃玉崑回答英国“拉特勒”号艦長麦勒西的三十条疑問时，又郑重申明了太平天国禁烟的堅决立場，第二十七条回答說“凡食洋烟水旱等烟及吃酒并奸淫皆我主天王遵天父圣旨斬邪不赦也”（轉引自蔣孟引：“1854年6月英国与太平天国的接触”），同年天王洪秀全还亲对一个外国船将說：“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将来事定，惟有洋烟勿再来华。”（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二十，太平朝之外交）鴉片貿易是資本主义侵略者掠夺我国的重要財源，太平天国这种宣布鴉片貿易为非法，并严防其輸入的措施，不但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維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給侵略者当头的致命打击。

正当太平天国雷厉风行禁烟之时，腐朽的清政府却許可外国侵略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鴉片輸入，英国在“1856年輸入中国的鴉片，約值3,500万元，英印在这一年內，在鴉片壟断貿易上得到了2,500万元的收入，即占国家收入总額底六分之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第101頁）。不仅如此，英法侵略者还在1858年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爭，强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約承認鴉片輸入为合法貿易，此后，外国鴉片的輸入更是有增无已。

針对清政府这种腐朽的卖国行为和帝国主义大肆販卖鴉片的可恥勾当，太平天国也采取了更为堅决更加徹底的全面性的禁烟政策，从而把禁烟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具体反映在1859年由干王洪仁玕提出而由天王批准执行的“資政新篇”里面。“資政新篇”明确規定：“禁酒及一切生熟黃烟鴉片，先要禁为官者，漸次严禁在下，絕其栽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太平天国”第二冊，第536頁）1860年太平天国后期卓越的軍事統帥——李秀成，在苏州地区大力推行太平天国各項社会經济制度的同时，即認眞地貫徹了“資新政篇”的禁烟政策。据当时苏州地主阶級文人潘鍾瑞記載說：“……不許民間吸烟，見烟袋輒为折毁弃……鴉片之禁尤酷，而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太平天国”第五冊，第284頁）另一地主阶級分子在“劫余灰录”中也說：“賊之烟禁极严，見即斬首。”次年忠王又不顧帝国主义的威胁叫囂，派大軍解放了早在1842年南京条約中辟为通商口岸的宁波，宁波当时已成了侵略者輸入鴉片的基地，太平軍在这个被外国鴉片販子統治的城市严厉地取締鴉片买卖和防范鴉片入口走私活动。据当时英国鴉片公司“怡和洋行”宁波支店的負責人格林向他的主子报告說：“一箱鴉片都沒有卖得出去。”（“太平天国史稿”第139頁）另一个宁波地主分子柯超也在“辛壬瑣記”里說：“每过賊卡，其搜查之酷，如寻針芥。以禁吸洋烟为名，或偶見有烟具，不論件之大小，即重加譴責。”（柯超：“辛壬瑣記”抄本）由此可見太平天国后期的禁烟政策比前期执行得更加徹底，它的烽芒还針对着外国侵略者的鴉片貿易，給了侵略者以极沉重的打击，这是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在軍事斗爭以外，集中在鴉片問題上的剧烈斗爭，也是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者、維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革命斗爭，它表現了偉大的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革命气慨和光荣传統。

綜上所述，太平天国禁烟政策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它是在鴉片战爭后，中国已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鴉片大量輸入、中国社会經济遭到严重破坏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瀕于破产的严重危机下而提出的一項社会政策，这种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和太平天国其他革命政策一样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它象一付清凉剂一样，感召着民族的觉醒，挽救了成千成万被鴉片毒害的中国人的生命，严重地打击了鴉片販子的侵略，所以它能在十几年的長期而艰苦的斗爭里，从上到下，从金田到天京由天京到各地，由內到外有始有終地加以执行。

教学問題



天津一中等校历史教学改革动态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后，全国各級各类学校都在根据党所指示的教育工作方針进行教育改革。为了配合当前的教改工作，及时报导中学历史課的改革情况，本刊編輯部和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在最近邀請了天津几个中学的少数历史教师开了一次座談会。参加座談会的有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十三中学、三十五中学和三十八中学的部分历史教师。

参加座談会的这几个学校，目前已积极着手根据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河北省、天津市教育会議的精神，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并以此为綱，推动从教材、教法、教学制度到教育教学思想的全面的、系統的、彻底的教学改革。还在系統的教学改革之前，这几个学校的历史課已經进行了一些尝試性的改革，历史老师們在教改中解放了思想，以教育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为指导，創造性地进行了某些改革与尝試。现在把这几个学校历史課的改革动态，就下述几方面做一些簡单的介紹。

（一）在教学中正积极貫彻厚今薄古的方針，注意了恰当地联系现实、联系学生的思想認識实际。这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从十三中和三十八中的教学中看出。十三中的教师过去片面强調所謂課程的系統性和科学性，备課时只着眼于收集資料翻閱参考书，完全忽視学生的思想实际狀况；有的教师过去認为古代史不可能联系现实，因此講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时不去联系对比我国当前的农具大改革，講古代的兴修水利时不联系对比我国当前的群众性的大搞水利建設。这就无法使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經过整风和对教育方針的学习，大家認識到"三結合"的重要意义，开始重視了这一方面的努力。为了做到心中有底，教师从一开学就全面研究教材，研究历史課联系现实的原則精神，并且在日常备課时以相当的时間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和研究国内外新形势的发展，以便随时和教材恰当地結合起来。教师走出了办公室，向班主任、各科任老师、团队和班干部等各方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同时也通过参加学生的政治課討論和班会等各种活动，直接地了解和熟悉学生。

由于重視了厚今薄古和联系现实，十三中的教师在备課中确定教学目的时，就不再被教学参考书中所提示的內容束縛，不再满足于只是对学生进行一般社会发展規律的教育，而是从现实出发补充必要的新的內容。例如，最近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峽地区向我国进行軍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我国人民曾举行了几千万人的庄严的示威遊行，我国政府也对美机美艦的侵犯連續发出了严重警告。有的同学对此認識不足，曾提出警告和示威遊行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問題。教师在講鴉片战争后昇平社学領导群众拒絕英国侵略者进广州城和举行示威迫使英国人釋放两广总督徐广縉的历史时，結合学生的这种思想情况，闡述了警告和示威的意义，指出警告可以揭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謀和面貌从而孤立敌人；示威遊行可以显示人民群众的无穷威力，打掉敌人的气焰，同时也可教育群众自己。这样的教学，旣解决了学生的認識問題，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热情。十三中学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在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們从农村生活的变化看到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但对于人民公社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本質还有模糊的認識。教师在講初三世界史原始公社部分时，結合学生的認識情况，把原始公社和我国今天的人民公社作了对比，指出在没有阶級、没有剝削这一点上，两者有其共同性。但原始公社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們生活得很困难；我国今天的人民公社則是具有高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基层組織，是过渡到人类最幸福的高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并联系现实的具体材

料闡釋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样就使学生对人民公社的性質和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認識，同时也貫徹了古为今用的精神。

和十三中学的历史教师一样，三十八中学的教师在确定教学目的时也重視了厚今薄古、联系实际的原則，并且他們除了課时教学目的之外，还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总教学目的也預作通盘考虑。例如，中国近代史的一般教学任务，是使学生認識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勾結封建势力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史，三十八中的教师認为这是在近代史的教学中必須加以貫徹的任务；但是从現实意义講，他們感到最突出的是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級領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問題，这应是这一阶段历史的突出的教育重点，也必須貫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去。比如，講太平天国革命，一方面要从它的爆发說明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以太平天国失敗的史实来說明沒有无产阶級的領导，农民革命不能取得徹底的胜利。講中国无产阶級的产生时，一开始就指出它比中国資产阶級的資格老，并且把分散在教材中的材料貫串起来，联系它所处的經济地位着重說明它的先进性、革命徹底性和社会基础广泛性，用以說明它必然要居于中国革命的領导地位。講資产阶級产生时，就联系当时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指出它天生的两面性，指出它虽是新生的阶級，但不可能領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还可以在以后講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加以証明。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級領导权的教育，不但便利了以后中国現代史的講授，而且有利于联系現实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二）在教学方法上，也进一步打破了老师講学生听的老一套形式，結合教学內容的改革，創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方面比較突出的尝試，是第一中学和三十八中学在講授若干历史課題时，采取了在学生中組織鳴放辯論的教学方法，通过学生自己的辯論来加深学生对課程內容的理解和解决学生中的实际思想認識問題。

第一中学在高一世界近代史中进行了这一創造性的尝試。在講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教师首先概述了这一段历史的基本內容，然后布置辯論題目，指定参考文章（中国青年报上的两篇短文），組織学生討論，最后由教师总結。概述只用一个課时，因此必須內容突出，使学生掌握必要的重点知識，了解基本綫索；同时教师在概述时要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要有明确的态度，以便予学生以正确的方向。辯論占两个課时，学生在事先根据辯論題进行充分的准备。辯論題有两类，一类是复习提綱性質，要求学生通过复习掌握所学的基本史实；另一类是思想認識方面的辯論題，目的是通过辯論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解决学生的具体思想問題。例如，这一单元共提出了四个題目：（一）在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过程中有哪些主要史实？（二）在革命过程中，資产阶級和人民群众各起什么作用？（三）你对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中資产阶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各作何估計？（四）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級才能認識眞理。在这四个問題中，前两个是要求学生熟悉史实，第三个是为了解决学生的認識問題，第四个是根据学生暴露出的“資产阶級也能認識眞理”这一錯誤思想而提出的，目的是要通过辯論求得解决。辯論时，要求学生不要只談一般的空泛道理，而要結合自己的認識，运用所学过的历史事实，或用現实生活中具体材料。教师要在辯論时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不走題，不扣名詞，敢于大胆暴露自己的看法，展开爭辯，自行解决問題。辯論結束后，教师要做总結。班上的共青团支部如果不同意教师的总結，还可以提出意見，这样也就可以防止教师所做总結中的片面性和錯誤。

三十八中学在初二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也做了同样的尝試，他們觉得辯論題要有啓发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以便易于展开爭論，并通过辯論解决一定的思想問題。例如，在鴉片战爭这一个单元里，教师提出了这样两个辯論題：（一）有人說若不是林則徐燒鴉片，战爭可能打不起来；又有人說不燒鴉片，英国同样要发动战爭。你認为哪个說法对？（二）有人說清政府对抵抗英国侵略是堅决的，只是因为打不过才講和的；又有人說清政府根本不愿打，人民群众才是眞正的抵抗者。你認为哪个对？辯論时，要求学生用一系列的具体史实来說明問題。第一个題目是为了使学生通过辯論認識資本主义侵略的必然性；第二个題目是为了使学生認識鴉片战爭中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問題上两条路綫的斗爭。在辯論之后又举行了一次測驗，然后由教师做总結。測驗的題目有两类，一类是要求学生記住的重大史实，如南京条約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內容；另一类就是辯論題，用以測驗学生对問題的理解程度。

一中和三十八中的教师在党支部領导下經过这一段的大胆的創造性的尝試，觉得这一种教学形式有如下几点好处：（一）通过这样的鳴放辯論，可以解决学生的眞实思想問題，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二）这种辯論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帮助学生把所学知識系統起来，加深对課程

內容的理解，記忆更加巩固。（三）一中的教师还感到，这一种教学形式迫使教师必須實行“三結合”，改造自己的思想，因为要确定教学目的和辯論題目，教师必須以兴无灭資为指导思想，因而也就必須改变政治上的客观主义态度，明确立場；同时还必須克服脫离政治、脫离实际的傾向，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

除了以上的这样鳴放辯論的教学形式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例如，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搞現場教学，到历史博物館及天津的一些历史遺迹去参观教学；組織同学訪問一些老革命同志，并請一些老干部、老工人来校結合历史課內容做革命斗爭故事的报告；为了引导学生注意当前的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师生合作从报刊和其他方面搜集积累一些有关东风压倒西风及国內工农业大跃进的材料等等。第三十五中学的历史教师准备搞三种試驗課：初中以上适当組織一些类似一中、三十八中的討論課；初二組織报告課，在教师講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史实之后，选出典型事件，請有实踐經驗的老革命战士做报告，以加深学生的認識；初一搞參观課。第三十八中学除了討論課外，还准备搞一些有意义的輔助活动，例如以反抗美国侵略为主題的幻灯晚会、組織学生举行历史故事講演比賽、历史活报剧晚会等等。

（三）根据加强政治、厚今薄古、精簡重复的原則，改革教材。在这方面，各校根据上述原則对教材做了初步删减与补充，一般都精簡了若干次要的有关統治阶級內部斗爭的教材，补充了人民从事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的教材。第二中学和第十三中学在中国近代史中，結合目前反对美国侵略活动的斗爭，增加了近百年来美帝侵华的材料，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此外，各校还重視了乡土教材的收集和編写、第一中学的教师已以天津的革命斗爭史为中心着手編写乡土历史教材，他們到工厂和农村去請老工人和老农民講述自己的斗爭經历，把記录整理成历史教材，然后用这些具体生动的材料教育学生。

× × ×

天津市各中学全面的系統的教学改革已在今年十月开始，上面介紹的只是系統改革之前的一些嘗試性改革。第一中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在党委領导下师生結合的方法进行教学改革的。第十三中学的教师在进行教学改革时也受到了学生的推动。例如，过去学生在鳴放时曾对教师講課时阶級感情不够充沛提过意見，教师在互相听課时也有此感觉。但是，有的教师認为教学不是演戏，不能象演員那样在演出前培养感情。在这次整风中間，学生在貼出的大字报中問老师說，为什么老师們在講秦始皇、唐太宗、努尔哈赤等帝王将相时，对他們的貢献肯定很多，对他們的活动講得津津有味有声有色，而在講述农民起义的領袖时却不能講得形象突出呢？学生的这一批評使教师深切地感到，教学中的感情性問題不是技术問題，而是立場問題；培养教学中的阶級感情，实質上是教师思想上的兴无灭資問題。这个例子使教师們初步体会到，在党委領导下师生結合的“三結合”方法，是推动教学改革的最好的群众路綫。（本刊編輯部）

关于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和跃进問題*

一

自从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作出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質量的决定”以后，特别是一年来，經过偉大的整风、反右、双反、交心等一系列的运动，在党的領导和教育下，我市中学历史教学已获得显著的成績，这主要表現在：許多教师都进一步加强了教学的計划性，按照历史課的特点，清楚地闡釋和分析教材，一般地注意了通过教材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教学中，重視新旧知識的联系并加强了直观教具的利用；在克服公式化的教学方法上也开始出現了新的萌芽；此外，大多数教师对于經常巩固学生历史知識的复习工作，也給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視，并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学生对历史課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質量，正在逐步提高。

---

* 这篇文章是本年8月27日北京教师進修学院在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学会議上所作的报告。——編者

二

我市中学历史教学的成績是主要的，应該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在历史課程中也突出地存在着以下几个現实問題，影响教学質量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因而也就开始了历史教学的改革工作。

（一）教学計划的問題。过去中学历史課教学計划突出地存在着从小学到高中的过分重复現象，正如某校学生在大字报中所反应：“在历史課中，关于从猿到人的問題，我从小学到高中，共学习了四遍，高小历史講、初一講、初三講，到了高二还要講，試問，这样重复，有什么必要呢？”我們認为这張大字报已揭出了我們过去教学計划中的問題癥結。在过去的教学計划中，对于古今历史的安排还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傾向。如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时間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时間大体相等，而初中世界史中，近現代的比重又大大少于古代及中世紀，尤其严重的是在高中，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时間为一年，而現代革命史則仅占十二周，約相当于古代史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况且在高中現代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至今还是一块空白。这些情况，已經不能适合今天的客观形势和教育方針的要求，非加改革不可。市教育局領导方面反复研究，并征求广大教师意見，对中学历史教学計划作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安排。

甲、初中教学計划：

年級	教材內容		課时
	上学期	下学期	
一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史 北京簡史	2
二	中国現代史	中国現代史	2
三	世界通史	世界通史	2

几点說明：（1）这个計划，本年暑假后从初一开始实行；初二、三年級暑假后仍按原計划課程順序进行教学，每周时数由原来三課时間减为二課时。（2）新計划中規定初三講授世界通史，与原計划同；但在教学內容上将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則，削减古代史部分，增加近現代史部分。（3）計划中的“北京簡史”应安排在哪里講授，中国古代史压縮在一个学期講授，是否完全合适，仍需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研究，希同志們多提意見。

乙、高中变动如下：

（1）文理不分科的学校，因为課本已經預訂，暑假后仍暫按原計划順序进行授課，其中除高三第二学期每周上課三課时外，其余各年級，每周均授課二小时。高三第二学期增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2）試行文理分科的学校，暑假后，文科各年級历史每周仍为三課时，教学順序从高一起作了这样的改变：高一、中国古代史（一年）；高二，中国近代史（半年），中国現代史（半年）；高三，世界近現代史（一年）；暑假后二、三年級教学順序仍按原計划执行。

（二）教材的問題。过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写的各年級历史教材，基本上是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結合中学教学实际編写的。不可否認，在以正确的历史知識教育青年一代，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針提出后，尤其是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出現了全国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大跃进的新局面，旧的課本已不能完全切合新的需要了。主要的是，旧課本在內容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厚古薄今傾向，叙述多，分析少；在材料的配备选擇上，还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表現着相当程度的客观主义态度；教材分量偏重，結合教学实际不够。此外，由于它是全国統一的历史課本，对于某一地方来說，就必然要呈現出乡土教材部分缺少和不足的現象。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和新的教学計划的需要，我們决定根据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精神，有步驟地重新編写初中各年級的历史教材。首先編写了初一中国古代史的教材。我們編写这个課本的指导思想是：“貫徹党的教育方針和厚今薄古的原則，担負起历史課的战斗任务，使历史教材面向生产，为政治服务。”在这个中心思想指导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原来的初中中国历史第一、二册为蓝本，結合地方特点和教师教学实际，进行改写。我們試图在新課本中，通过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两条基本綫索，在整个历史过程里，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基本原理。比如，我們在新課本中，对于宦官、外戚、党錮、太学生运动等統治阶級內部斗爭的史实，可不講的尽量不講；对于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也尽量避免过分渲染，而是結合人民群众的活动加以叙述；但对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爭和阶級斗爭的史实，則根据史料尽量地予以詳細介紹。

在教材的編写过程中，我們前后共召集了四次教师座談会，征求教师对每一課教材的意見；并邀請了人教社、师大、师院的有关同志座談及审稿，爭取他們的协作；这个教材是在党領导下的，各方面集体劳动的成果。

关于初二、三及高中各年級的教材，因教学計划顺序未变，本年均使用人教社按每周二課时重新改編的課本不另編写。教师在講課时可以根据需要，結合教材內容适当地运用一些乡土材料，但分量不能太多，以免影响进度。

我們的教材改革正在开始，还缺少足够的經驗，因此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逐步完成这一教学內容的改革工作。由于历史学科的內容与现实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国內外政治形势的发展，科学上新成果的不断出現，以及教学計划的变动，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对教材进行修改。因此，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审查教材中的缺点和錯誤，积极帮助改进教材，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这里要附带提一下教学参考資料的問題。过去人教社配合历史課本的編写，本来編印了一套教学参考书。但这一套参考书是在两年前編写的，随着今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已显得有些陈旧了，况且本市初一的历史課本已按新的教学計划重新編写，为了配合这个新課本的教学，我們征求了教师們的意見，認为还是有重編的必要，因此我們决定这样做了。但是在編写体例上，与旧参考书是有所不同的。新参考資料只着重教材重点和思想教育因素的深入分析，不介紹教法，以免限制教师的創造力。此外，在教材注释項下，还針对課文中的重点和难点，提供一些原始材料，供教师参考。这份参考資料，我們将油印作为征求意見的样品发下。今后是否仍需要編写这样的参考資料，請大家考虑决定。

（三）教学思想的問題。历史課是最富于思想性、战斗性的一門課程。历史課有着充分的內容和条件来貫彻政治思想教育。它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战线上所担負的任务至为重要。但是我們的历史教学，还未能很好地担当起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教学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只重知識，不重思想，教书不教人，管教不管导，願意講古代，不願講現代，教学方法形式主义，脫离实际等严重的厚古薄今的資产阶級思想；以致造成学生知識質量上的重大缺陷。如有的高中毕业学生平时历史考試每次都得五分，但在討論中竟說不出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两面性是怎么回事；有的学生虽然答出了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也有的学生听教师講完“四·一二”大屠杀后，得到的教育不是对蔣介石的痛恨，而却是：“蔣介石这小子眞有办法！”更严重的是有些高年級学生在社会主义教育課討論中反映出許多資产阶級思想和观点。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說明在我們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严重脫离现实、忽視政治的傾向嗎？

然而，这种思想已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逐漸有所克服。最近以来，在我市中学历史教师的思想及行动上，已經出現了跃进的新气象：

（一）教师們迫切要求自我革命，兴无灭資，普遍地加强了社会主义責任感，鼓足了革命的干劲。許多学校的历史教研組都在上学期期末考試以前，訂出了总复习的計划，提出“全組动員，加强协作，苦干若干天，为提高期考成績，消灭留級生而奋斗”的战斗口号，并为此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期考結果証明，教师們的辛勤劳动，已在学生学习成績上开出了胜利之花。

（二）許多教师都結合交心运动，檢查了教学中存在的“厚古薄今”傾向，并訂立了个人的紅专規划，提出要改造自己，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現代革命史，来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三）我市部分历史教师在本年四月与天津市部分历史教师联合在“历史教学”月刊上向全国历史教师发出了跃进倡議书，提出要和全国中学历史教师比紅专、比先进、比干劲、比鑽劲，在两三年內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紅透专深的工人阶級的历史教师。这个倡議已在本市历史教师及其他地区历史教师中起了良好的影响。

（四）目前有些学校历史教研組正在根据当前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重新研究历史教学的目的和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貫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針的問題；并在討論的基础上，訂出了一年的跃进規划。

（五）自整风以来，已有些学校注意并試行了历史教学方法的革新問題。如三十七中自上学期起，就在高三历史課中打破了“堂堂綜合課，課課講述法”的成規，試用了課堂討論的教学方法，在教师指导下来啓发学生自觉地学习历史，分析問題，得出結論。根据总結，已取得初步成績。这种試驗性的改革，虽然还是萌芽，但它是改革形式主义教学方法的一个值得重視的方向。又如实驗中学历史組在历史教学中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举例說，該校教师在講我国三大发明前，了解到初一学生对于火药也算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献这一問題，思想上不够明确，他們只想到火药的杀伤力，而没有想到它对征服自然的功用。根据这种情况，教师在課堂上講到火药的发明时，就先啓发学生回忆“五一”节之夜呈現在天安門上空的五色繽紛的焰火，然后問同学：你們知道焰火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誰发明的？这样就极其自然地解决了学生存在的思想問題，同时通过火药在工程爆破方面的应用

（如我国修建康藏公路时，曾使用火药来开山）和保卫和平的意义的說明，向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們認为，这种群众路綫的教学方法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三

目前，我市中学历史教学在新的形势推动下，正面临着全面跃进的高潮，教师們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嶄新气象，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为了争取历史教学彻底改革的成功和再接再厉地大跃进，特提出几点意見，供教师們参考。

首先，历史教学的改革和跃进必須与历史教师的思想改造結合进行。因此要求历史教师做到政治挂帅，以虛帶实，在整风、交心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継續加强兴无灭資的自我思想改造，从根本上改变立場、观点和方法。为此，就必須認眞学习以毛主席著作为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堅决貫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批判資产阶級教学思想。

历史是一門具有高度科学性和思想性的課程，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我們在历史教学中，必須加强对学生进行四个基本观点——工人阶級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辯証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我們进行这些教育的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他們更好地去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設服务。

为了改变过去"脫离革命实践的煩瑣主义"的教学思想，不断提高历史教学的战斗性，我們在历史教学中必須堅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則，要賦予历史課以現实的意义。在历史教学中貫彻厚今薄古的主要做法应当是結合教材，联系实际，首先要联系当前国内的生产建設和国际的政治斗争，以堅定学生的工人阶級立場，加强学生对于共产主义胜利的信心。其次，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学生的思想是錯綜复杂的社会現实的反映，他們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表現。历史教师应对学生中存在的各种形式的非无产阶級思想进行适当的有力的批判。在批判时，要注意抓主流、抓本质，抓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同时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而不是用簡单、粗暴的办法。再次，要联系乡土教材。在历史教学中，联系乡土教材，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識，使他們更具体地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面貌，而且可以培养他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做好历史教学工作的另一方面，还必須充分发揮学生学习的积极热情和主动性，采取群众路綫的教学方法，在教师指导下，我們要相信学生能把历史課学好。教师在教学中要发揮主导作用，但要防止包办代替的偏向。要把教师的积极性和学生的积极性結合起来。目前除在較低年級，仍应以教师生动的講解并指导学生閱讀課本为主要教学方法外，在高年級，根据一些学校試驗的結果，我們認为，是可以考虑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需要适当地采取旨在加强学生課外閱讀、啓发学生邏輯思維和培养学生分析綜合能力的課堂討論方式的。此外，也可考虑試驗課堂以外的授課方式，作为輔助的教学方法。

为了使我市中学历史教学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总結和推广教学經驗，也是十分重要的。几年来，我市历史教师在教学上是积累了不少經驗的，倘能加以总結，去粗取精，将是历史教学工作中宝貴的财产。

在今天进行历史教学全面改革的同时，我們要求每位历史教师都能重視自己的辛勤劳动，从备課、課堂教学、教材組織，教法运用一直到效果檢查，随时积累經驗，进行分析总結。各校历史教研組也要在个人总結的基础上，发动教师，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全組的經驗总結。各校历史教师及历史組可以把教学經驗随时寄給我院，通过"教育通訊"介紹出来。

× × ×

在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浪潮中，我市的历史教学工作已經响起了进軍的号声，迈出了跃进的第一步。在全体历史教师継續不断努力下，可以預期我市历史教学的万馬奔腾的全面跃进局面，必然即将到来。我們要彼此勉励，相互鼓舞，使本市历史教学从根本上改变面貌。但是，也不能把历史教学的改革看作是一帆风順的过程。在历史教学的各个方面，还都存在两条路綫的斗争，还有許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然而我們确信：依靠党的領导，大家的努力，堅定工人阶級立場，在教学中堅决貫彻执行社会主义教育方針，加强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堅持厚今薄古的原則，采取群众路綫的教学方法，我們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完成历史教学的战斗任务，在历史教学陣地上高插紅旗！

"厚今薄古"对历史教学的指导意义

徐柏林

一年以来，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的。然而，这些进步跟工农业大跃进和教育事业大跃进比較起来，就显得远远地落在后边，不能适应这一巨大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产生問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諸如教学計划、教材內容和教学方法等等都有很大关系。但其中最根本的問題，还在于历史教师的立場观点的改变。今年春天，党提出了"厚今薄古"方針，給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指出了方向，使我們有了前进的指針。"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学术思想战綫上"兴无灭資"还是"兴資灭无"两条道路的斗爭，是历史教师由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轉变为无产阶級知識分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提高历史教学質量的"綱"。我們历史教学工作者必須向最堅决最彻底的"厚今薄古"派、历史的創造者——劳动人民学习，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講劳动人民的历史，和劳动人民一道变革世界創造历史。我們的历史教学必須为当前的政治斗爭服务，为生产建設服务。"厚今薄古"方針对历史教学的指导意义是很大的，就个人学习心得提出几点初步体会：

（一）"厚今薄古"指明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粉碎了历史循环、历史倒退的謬論。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循着螺旋的路子不断前进不断上升的。不管这种螺旋的路子是多么的迂迴曲折，但总是前进和上升的，最終一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

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延續了二千几百年之久，但我們試比較封建初期的秦汉、中期的唐宋和晚期的明清，便知道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別是明清时期，資本主义的萌芽已經发生，如果不是受到外来資本主义的扼杀，中国社会也必然要进入資本主义时代。

資产阶級的历史学者，从他們的阶級利益和阶級偏見出发，把历史发展道路上的迂迴曲折，說成是循环倒退的。或者只承認量的漸变，不承認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質的的飞跃。他們既然認为今昔如一，甚至今不如昔，自然就会"厚古薄今"。我們提出"厚今薄古"，就是以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規律，来粉碎这种历史循环、历史倒退的謬論。

（二）"厚今薄古"是"兴无灭資"的有力武器，推动历史教师的思想改造。

有些人的"厚古薄今"思想，是地主資产阶級沒落思想的反映。我們的"厚今薄古"，就是給这种思想以严肃的批判，使他們認識到已死的剝削阶級永远不能复生，"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

有些人存在"厚古薄今"思想，是由于讀过几本綫装古书，占有一些零碎史料，便洋洋得意地認为有本錢翹尾巴了，一有机会总要卖弄一番。我們的"厚今薄古"，就是要使他們从个人主义的神志昏迷中清醒过来，認識到自已的知識实在淺薄得很，自己的态度实在惡劣得很。

有些人把"厚古薄今"当做思想改造的"避难所"。我們的"厚今薄古"，就是放一把火，燒掉这个"避难所"。

有些人的"厚古薄今"，是积习已深，好古成性，一遇到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总是格格不入。我們的"厚今薄古"，就是使他們从过去的已經不存在的时代里解放出来。

"厚古薄今"对于某些历史教师来說，往往如影随身，寸步不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我們对資产阶級思想的清除和对无产阶級思想的树立。我們拔掉"厚古薄今"的白旗，树起"厚今薄古"的紅旗，就是"兴无灭資"的一个胜利。

（三）"厚今薄古"明确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目的性。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調动古人的积极因素为今天服务。

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称："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历史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和党性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是为了无产阶級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它是属于无产阶級和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厚今薄古"的目的就是"为今"。

历史如何为現实服务？古人如何为今人效劳？我們并不需要象某些农民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政治活动家

一样，“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老的服装，說这种借用的語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他們这样做正表明他們阶級力量的軟弱，不敢相信自己罢了。我們要历史为現实服务，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是使学生認識广大劳动人民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規律，确信阶級社会必然死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树立无产阶級专政和党的領导的堅强信念。其次是集中劳动人民的經驗，并且使它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成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武器。再次是培养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能力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設者和保卫者。

当然，历史教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們历史教师所一再承認了的。但在口头上承認是一回事，而在实际教学中具体加以应用却是另一回事。怎样才能使两回事成为一回事呢？就要使历史教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一根本目的貫徹到每一課时中去，成为教学实践的指南。否则，縱然发了誓，主观上很自信，終究还是两回事。

（四）“厚古薄今”是破除迷信，打破成規，解放思想，引导我們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我們是历史悠久、遺产丰富的国家，有許多优秀的东西可以継承和学习，这对于今天社会主义的建設有很大的好处。但長期的封建統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又給我們知識分子特别是历史教师揹上了封建主义的旧传統和資本主义的洋教条的思想包袱，使我們头脑僵化，眼光短小，手脚笨重。这对于我們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是极不相称的。我們的“厚今薄古”，就是不怕古人，不怕洋人，不自卑，不妄自菲薄，敢想、敢說、敢写、敢干、敢于大胆創造和奋发前进。我們正在干着我們的先人所没有干过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有我們的先人所没有的共产主义的气概和风格。

我們在历史教学上的因循保守，步慢差費、人云亦云、“不为天下先”……都应該彻底地打破。

（五）“厚今薄古”指出只有以“由今到古”的科学研究方法，才能眞正解决古代史上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出现以前，人們对人类历史不可能有正确的認識。生在原始社会的人，并不懂得原始社会。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同样不懂得他們自身所生存的社会，也不懂得他們以前的社会。只有生在現代社会的今人——具有馬克思主义历史学修养的今人，才能懂得今天的和今天以前的社会。

現代社会是高級的复杂的。当我們認識了高級的复杂的現代社会以后再去研究低級的簡单的古代社会，正如我們解剖了人体之后再去解剖猴体一样，就比較容易了。“博古通今”論者認为“博古”才能“通今”，也就是認为“厚古”才能“厚今”，恰恰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比如我們要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如果不是抓住当时的阶級关系、經济制度、生产狀况、革命形势等等着手研究，而漫无目的地“博古”——搞什么“屯田”、“占田”、“均田”、“皇庄”等等历史上的土地制度，那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厚今薄古”，就是倡导“由今到古”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要求我們从現代出发来研究古代。这样，不仅在方法上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且也才能使研究和現实密切联系，更好地为現实服务。

有人說：“厚今薄古，会弄到‘割断历史’和‘数典忘祖’。”这如果不是有意識地把“厚今薄古”曲解成为“厚今废古”，以便最后推翻“厚今薄古”，便是在方法論上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毛主席說：“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701頁）这才是研究古代史唯一正确的方針，也是研究古代史唯一正确的方法。

（六）“厚今薄古”可使我們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得到最妥善的解决。

目前中等学校历史教学中的計划、教材、教时和教学人員力量配备等等的問題，都需要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則重新修訂，使我們在最短期間內，产生一套合用的教学計划，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資料出来。在教学和研究近代現代史人員的力量配备上，应立即加强。某些人的思想問題应該解决。听說有些教师不愿教近代、現代史的原因是怕犯政治錯誤，給人家抓小辮子，倒不如教古代史省事。其实，这种認識的本身就是一种錯誤。我們的教学工作犯不犯錯誤，絕对不是决定于教材的今古，而是决定于有无无产阶級的立場观点和教学态度是否正确。难道在古代史教学中的貴古賤今，頌古非今等等，就不錯誤了嗎？不值得批判嗎？

以上几点体会是否正确，希望同志們指正。

我是怎样講述“巴黎公社”一課的

遼宁省安东市第五中学　伍守里

一　教学目的是怎样确定的

教学目的是課堂教学的指导方向。教学目的的正确与否对于一堂課的成功或失敗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負責的精神愼重地来制訂教学目的。我在初三年級講“巴黎公社”这一堂課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巴黎公社的講述，使学生了解巴黎公社出現的原因，它的政权性質、公社人民英勇斗爭的精神以及公社的偉大貢献，从而認識巴黎公社是馬克思主义无产阶級专政理論的第一次試驗，是苏維埃政权的雛型，它丰富了无产阶級革命斗爭的經驗，給与資本主义第一次打击。并通过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揭露資产阶級右派反对无产阶級专政、反对党的領导、破坏工农联盟的阴謀，教育学生为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級专政、維护工农联盟而斗爭。”这一教学目的是在充分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后确定的。

（一）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是我們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灯塔。去年“人民教育”九月号的社論中曾指出：教育工作者都要認眞的学习，各科教学都必須貫徹新的教育方針。作为一門党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来說，怎样通过教学的形式来貫徹这一方針就成为最迫切的任务。經过反复研究教育方針的精神，結合历史科学的特点，我認为历史教学貫徹新教育方針必須把系統的历史科学知識的講述和政治思想教育結合起来，把历史上的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的重大事件和現实的政治斗爭、生产斗爭結合起来，使历史教学緊密地为政治、經济服务。根据这一認識，我在教学目的中，就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科学知識上的要求，也明确地規定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結合現实政治斗爭的方向。

（二）深入鑽研和体会教学大綱和教材的精神实質。在明确了历史教学如何貫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的基本途徑后，我进一步根据教育方針的要求，鑽研了教学大綱和教材。在大綱說明中明确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是世界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的事件。巴黎公社是馬克思主义无产阶級专政理論的第一次实践，是苏維埃政权的雛型，它給与資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根据大綱的精神，我反复地研究了教材，終于明确了这一堂課应該闡明的中心思想是：巴黎公社的建立是資本主义內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虽然失敗了，但是在世界历史上它具有偉大的历史意义，它丰富了无产阶級革命斗爭的經驗，使資本主义从发展阶段走向衰落阶段。为了突出这一中心思想，我認为必須抓住以下几个問題很好地加以闡述：（1）巴黎公社革命发生的原因（着重揭示出其发生的必然性）；（2）巴黎公社政权的性質（突出无产阶級专政的必要性）；（3）巴黎人民英勇斗爭的精神（一方面歌頌人民的斗爭，一方面揭露反动資产阶級的残暴）；（4）公社的失敗原因和历史意义（突出馬克思主义政党領导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及給以后的影响）。所以我在教学目的中把上述的中心思想和关鍵性問題反映了出来。

（三）考虑了結合当前有关的政治斗爭并了解了学生思想的实际情况。在明确了这一堂課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內容后，我即圍繞其考虑如何联系突出反右斗爭这个基本內容，突出批判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領导、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破坏工农联盟等問題。为了做得有的放矢，我深入了解同学有关这些問題的認識，我了解到部分同学有这样一个錯誤的看法：“不进行反右斗爭也不碍于社会主义建設，因为社会发展是有規律的，資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这一錯誤的看法不澄清，学生的社会主义覚悟就不能提高。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曾向学生进行过反右斗爭的教育，而这一課历史教材更能加深学生对反右斗爭偉大意义的認識，很有利于澄清学生思想中的糊塗观念。所以我在教学目的中明确地提出了“結合反右斗爭”的教育任务。

二　怎样貫徹教学目的的

貫徹上述的教学目的，我認为必須抓住以下几个問題：

（一）揭示巴黎公社出現的必然性，以体現历史

发展的規律，是貫徹这一堂課教学目的的重要問題之一。为解决这个問題，我抓住了以下三个环节：

（1）通过課堂提問，把巴黎公社的革命和已講过的历史知識从內在关系上联系起来。例如我問学生：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国有哪些工人运动？六月大起义有何意义？科学共产主义何时誕生的？它的基本內容和意义是什么？最后我把学生的答案加以綜合和概括，引导学生認識巴黎公社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2）对“普法战爭”一段教材，我把它做为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于1871年的具体原因来講的。在这里着重地指出了由于法国資产阶級背叛祖国，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特別尖銳起来，从而爆发了革命。

（3）在講巴黎公社的偉大历史意义时，指出了巴黎公社革命不仅給法国資本主义制度以严重的打击，也严重地打击了整个資本主义制度，从此資本主义走向衰落阶段。

把上述三个問題前后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巴黎公社这一历史事件是資本主义由发展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講授，学生就不至于脫离資本主义发展过程来孤立地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了。

（二）怎样深刻地体現无产阶級专政、党的領导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是貫徹这一堂課的教学目的的关鍵。

首先从体現无产阶級专政的必要性来說，我主要是从分析公社的政权組織和經济政策的特点和意义，并結合必要的啓发提問来进行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学生明确“无产阶級专政是无产阶級求得自身解放的重要手段”这一原理。例如在我講完公社的各項經济措施后，我向学生連續提出来一些問題：（1）巴黎公社为什么能实行这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学生答：因为它是无产阶級的政权……。）（2）資产阶級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不能够实施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学生答：因为它是資产阶級政权，阶級本質不同。）（3）从上面几个問題看，无产阶級要眞正地不受資产阶級剝削和压迫，眞正地得到解放，你認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問題？（学生答：必須推翻資产阶級政权，建立无产阶級政权。）通过这一系列的提問，学生对无产阶級专政的必要性已有了比較明确的認識，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級要想求得自身的徹底解放，必須要建立无产阶級专政，这是巴黎无产者給以后的无产阶級革命提供的宝貴的經驗。”

其次，关于馬克思主义政党領导的必要性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这两个問題，我是在講“公社对凡尔賽斗爭”一段时体現出来的。体現党領导的必要性时，我采取了层层分析的办法。首先我指出公社在建立的初期就犯了严重的錯誤，他們沒有乘胜向凡尔賽进軍摧毀反革命的老巢，結果給反革命以喘息的时間，使革命政权以后不久被反革命武裝所围困，从而給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惡果。接着我就进一步分析公社沒有立即向凡尔賽进軍的原因，在这里我指出：“公社沒有立即向凡尔賽进軍而忙于內部选举了，他們認为这是最合乎人民利益的。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錯誤。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公社的最大任务、人民的最大利益不是內部的选举問題，而是徹底消灭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以巩固革命政权的問題。”最后我又分析这个錯誤产生的根源說：“这个錯誤的产生說明了公社的領导对当时形势缺乏足够的認識，他們还不善于在革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明确的具有远見的革命策略，分不清某一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次要任务，因而本末倒置給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为什么他們不善于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当时公社还沒有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領导。”到这里，关于党的領导作用就显露出来了。

在說明巴黎公社由于沒有政党的領导，而犯了严重的錯誤后，接着我又把工农联盟問題联系起来，指出公社始終未能与农民結成联盟，归根結底也是缺乏馬克思主义政党領导的結果。所以巴黎公社在后来与凡尔賽斗爭时，是孤立无援的。

（三）怎样与現实的政治斗爭相結合的？在这一堂課里我是这样做的：

在全面講授完了以后，我引导学生得出公社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即无产阶級革命取得胜利必須有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导，建立无产阶級专政和工农联盟。接着我指出，这些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問題。接着我又指出：党的領导、无产阶級专政、工农联盟，不但过去在夺取政权时需要，就是今天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沒有它不行的。然后我把話題逐漸引向今天右派向我們进攻的阴謀上去說：“右派分子正因为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才惡毒地集中攻击我們党的領导、无产阶級专政和工农联盟。”为了更有力地揭露右派向党进攻的阴謀，我接着举了一些我校右派分子向党攻击的反动言行，通过分析，指出我校右派是与所有右派一样，是一脉相通的，进而我就啓发学生思考：“大家想想，要是右派分子的阴謀一旦得逞的話，我們的革命会遭到怎样的后果？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干部將会遭受怎样的折磨？”这时我便把公社失敗慘遭屠杀的情境与右派的阴謀联系起来，让同学們去深思。（稍停）接着我用坚定的語气說：“右派分子的阴謀是不可能得逞

的，因为我們今天和巴黎公社时代不同，我們有着堅强的中国共产党的領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級专政，有巩固的工农联盟，因此，右派的失敗是必然的。”随着我就批判同学們思想上存在着的誤錯認識說：“我們还有少数同学由于認識不清，說‘不反右也无碍于建立社会主义’，說‘历史发展是有規律的，資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不反右是什么問題呢？不反右就等于不要党的領导，不要无产阶級专政和工农联盟，没有这三者还能建設社会主义嗎？封建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是經过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由資本主义就能自然地走上社会主义呢？”最后我从正面向学生提出了要求說：“我們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也应該从这里吸取經驗教訓，特别是在今天，在两条道路的斗爭中，我們要为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級专政、巩固工农联盟而斗爭，既或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退让。”

（四）我以爱憎分明的鮮明的阶級情感歌頌了人民的英勇斗爭，揭露了反动資产阶級的殘暴。这一課是掌握如下精神来貫徹的：

在講授中，我注意了自己的感情与教材思想的一致，并运用了有关文艺作品和形象化的語言，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生动的講述。

例如，講巴黎公社成立，我就以兴致勃勃的心情，首先根据課文里簡单的描写并結合課文里的插图講解了当时动人的情境后，为了使学生形成更深刻的再造的想象，我接着就以充沛的情感朗讀了巴黎公社委員瓦列所写的“叛徒”中的片斷：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啊！

可爱的明亮的阳光把炮口鍍成金色；鮮花的芬芳，旗帜的沙沙声，象平靜而壯闊的淡青色的河水一样流着革命的吼声。这激动，这光明，喇叭的响声，青鋼的光輝，希望的火花，光荣的芬芳——由于它們，凱旋的共和軍滿怀着自豪和愉快……

号手，吹起进行曲吧！鼓手，擂起进軍鼓吧！

同志，拥抱我：你的头发已斑白，正象我一样！而你，在街垒背后玩耍的小孩子，来吧！我要吻你。

三月十八日，在你的前面展开了美好的前途。我的孩子，你本来可能象我們，在黑暗中成長，在泥濘中跋涉，在血泊中掙扎，为恥辱而喘不过气来，忍受着不可言喻的羞恥和苦难！

这一切都完結了！”

在講到巴黎公社失敗时，我忍不住用悲痛而憤慨的語調来揭露了資产阶級的殘暴。我首先概括地叙述了資产阶級殘酷无情的血腥蹂躏情境后，継而即重点突出地补充了瓦尔連被害的經过，以向学生有力地进行阶級教育。我說：“瓦尔連就是当时許多被害者中的一个，他被俘后，劊子手們把他双手反綁起来，在巴黎大街上拖来拖去，整整拖了一个多鐘头。他的头被劍劈破了，血淋淋的。他已經不能走了，站也站不起来了，但那些愚蠢的暴徒，却不能从他的口里得到半点的招供。（譏諷地）他們没有办法了，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这个剛毅不屈的无产阶級战士摔在地上，把他枪杀了。”（这时随着教师語調放慢，同学的心情悲憤交集，涌現于面容）稍停后，我就立刻自信地說：“同学們（有力地）劊子手只能毁灭瓦尔連的身軀，但永远也毁灭不了他那不朽的灵魂！当瓦尔連在就义前的最后一息时，还昂头高呼：‘公社万岁！’”（稍停）“是的。”这时我又堅定有力地加深上述的意思，“象瓦尔連这样忠心耿耿于无产阶級事业的战士，他的灵魂将永远活着，活在我們每一个知道巴黎公社的人們的心里。”学生听到这里，頓时肃然起敬，他們为公社成立而欢欣；为英勇的精神而鼓舞；为公社的失敗而惋惜和憤慨。

課后，同学們反应都認为这堂課使人深受感动，思想得到了很大啓发。例如有些同学說：“听了这一課，不仅使我懂得了巴黎公社的历史，而且从公社失敗的教訓里，使我深深認識了今天資产阶級反动派向我們党进攻的恶毒阴謀。以后，我一定要划清敌我界限。”还有些同学說：“将来我長大了，一定要学瓦尔連一样，鞠躬尽粹地为人民服务，好好听党的話。”同学們說的这些，我認为都是自己的心里話。

（上接第48頁）

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增强了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文物展覽与参观教学对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和巩固书本知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过去講文化史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学习兴趣不大。这次在展覽室中他們很感兴趣地提出許多問題。他們問：“老师，貨币为什么有刀形的？”經过解釋，学生就知道了貨币的来源与劳动生产的关系。高中三年級学生系統地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認为对系統复习中国史有很大的帮助。初中一年級的学生經过参观教学获得了巩固的历史知識。期末考試时教师出了这样一个题：“明清有哪些科学家？他們的著作是什么？”一年級二班五十三个学生中絕大多数答得很对。比对其它任何試题都答得好。最有趣的是，小学生到野外去拔猪菜的时候，很有兴致地联系到李时珍研究药物的故事，自己願意学李时珍的研究精神。

我校历史教学中的文物展覽与参观教学

山东萊陽一中历史教研組

經过偉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教师的社会主义覺悟提高了，革命干劲更大了。我們認眞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方針的指示，認識到要提高教育質量，必須克服脫离政治、脫离生产、脫离实际的傾向。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管課內，而且要管課外；不仅教书，而且要教人。本学期我們在学校党政領导的支持下，在改革課堂教学的基础上注意加强了学生的課外活动和課外輔导。我們搜集編写了乡土教材，加强了对工农子女的輔导，为配合中国現代史教学又組織了电影晚会（影片是"星火燎原"），这些活动都收到了一定效果。

为了巩固历史知識，对学生进行一次系統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敢想、敢說、敢做的社会主义創造精神，我們組織了一次中国历史文物展覽，并在展覽室內进行了参观教学。現把展覽和参观教学的情况介紹如下：

（一）展覽內容：就我們的現有条件，把学校和教师所收藏的文物，分为古代和現代两部分来展覽：

古代文物包括实物（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的模型、石器、青銅器、瓷器、漆器、景泰蓝、宣德爐、雕刻、历代金属貨币等五十余件），古代文献（凡是課文上講到的各种文献差不多都有），著名的字画和"人民画报"上所登載的有关历史图片。

現代文物包括重要文献（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的著作的单行本和其他政治的文艺的著作共二十余种），图片和各种乡土材料（如抗战时期胶东烈士和英雄的傳略，胶东抗战形势变迁图，还有我們編成的乡土教材——"抗战时期胶东人民的英勇斗爭"等）。

我們对每一件文物都写了詳細的說明卡片。学生参观时，我們就对学生进行講解并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問題。在展覽的同时为了扩大教育效果，我們又組織了中国古代文物幻灯晚会。

（二）参观教学：在各班学生輪流参观結束后，高中二年級和初中一年級历史課的"明清文化"一节提前一周在展覽室內进行参观教学。

教师在組織教学后講授新課前，依据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精神把古代文物展覽品加以概括的說明和总結，然后轉入新課講授。教师在每講到一个人物和他的創造发明时便具体地指导学生看有关展覽品。如講到李时珍时，便把"本草綱目"拿給学生看，并生动地介紹李时珍著作"本草綱目"的过程。李时珍以一普通劳动者，由于刻苦自学，当劳动人民的学生，把理論与实踐結合起来，因而能够写成了这部有很高科学价值的药物学著作。学生在听講过程中引起很大兴趣。

教师在講授中特别强調了劳动群众創造发明的无穷智慧，激发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但也注意防止学生产生不正确的"怀古情緒"，教师强調指出，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但在剝削阶級的統治下是不能充分发揮的，相反要受到压抑和摧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充分地发揮出来。接着联系当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英雄豪迈的事迹。指出，只要破除迷信，树立敢想敢做大胆創造的共产主义风格，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会以胜古人不知几十万倍的速度来建設我們的偉大社会主义祖国，創造美好幸福生活。这段講話对学生鼓舞很大。

（三）学生的反应：这些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学生說："我們祖国的文化眞是悠久、眞是丰富！""有許多創造发明都出自普通的劳动人民。"現代文物的展覽对学生的教育最大。他們看到抗战前山东国民党統治者韓复渠与日寇的合影和在国民党統治下川陝人民飢饉情况的画片，增强了对敌人的憎恨。看到理琦、王文、任常倫等烈士傳略，同学們无限敬仰地說道："他們都是青年，眞是我們学习的榜样。"方志敏烈士的遺著——"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对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方志敏烈士的不屈的偉大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学生。学生对乡土材料很感兴趣，他們对胶东人民的抗日斗爭的事迹感到更加亲切，也感到自豪。通过展覽增强了学生对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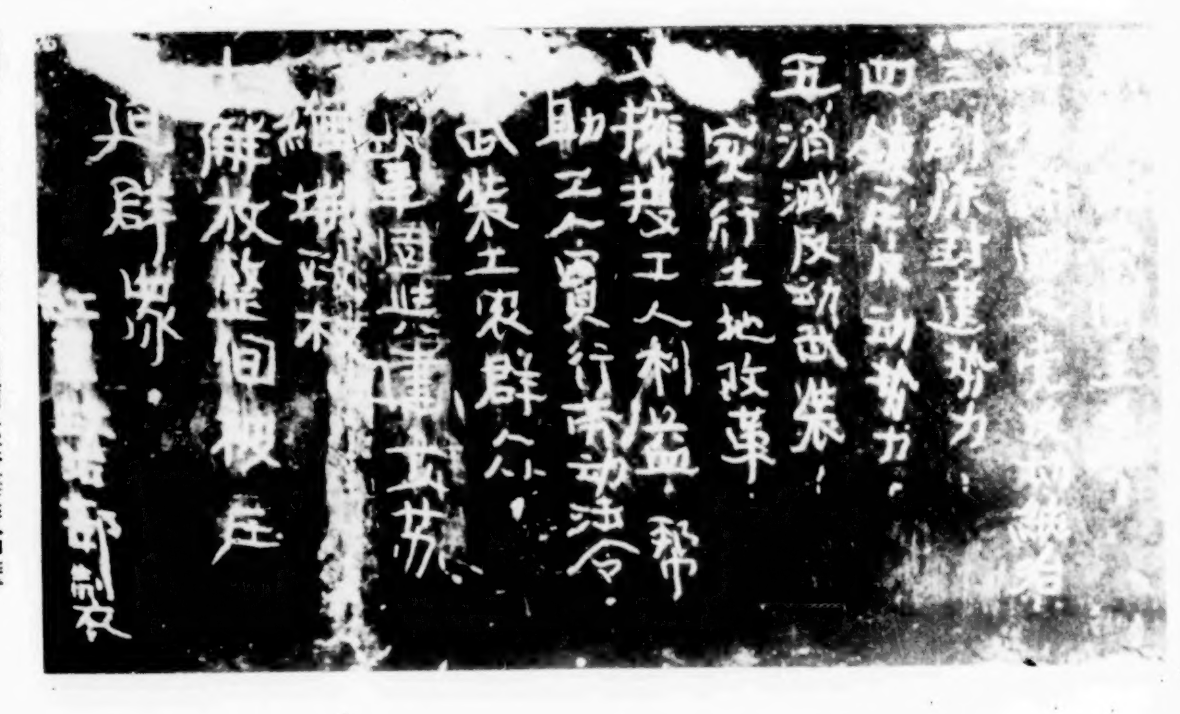
（下轉第47頁右欄）

中國工農紅軍佈告

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
苛捐雜税重重，又復妄加殺戮。
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
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
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
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
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

紅軍總司令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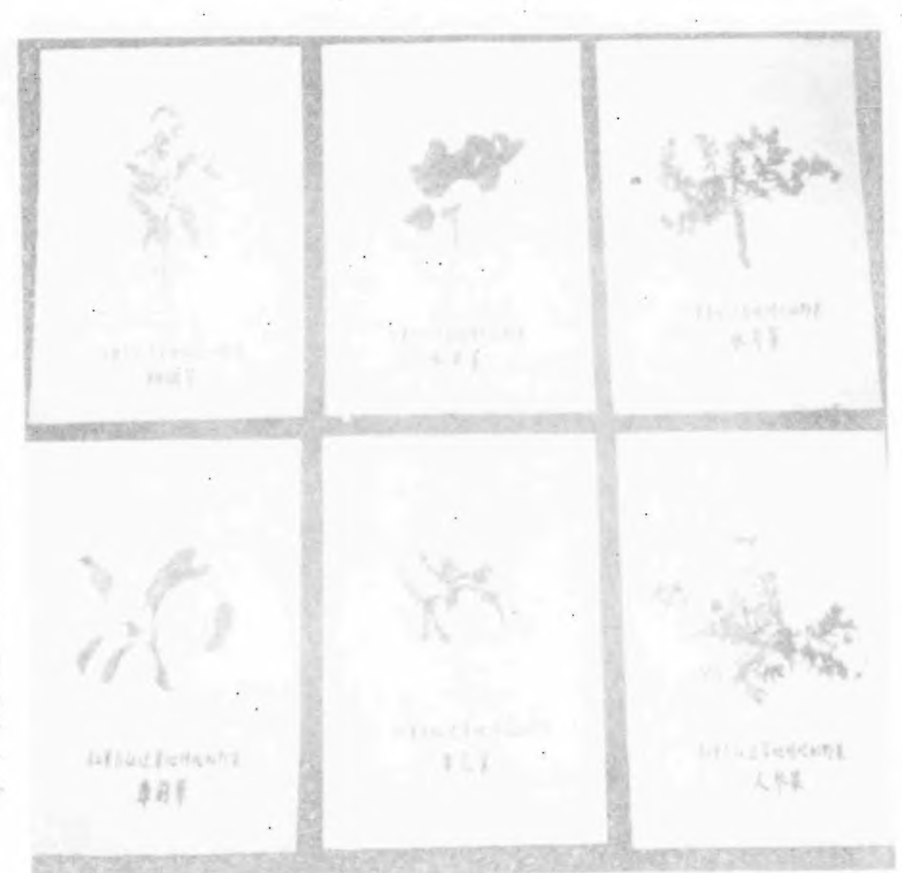
圖三 中国工农紅軍于一九三五年五月通过川康彝族地区时所发的布告。



圖四 紅軍在長征途中在川西茂滁庭旁石壁上所刻紅軍十大綱領。



圖五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賀龍給夏拿吉丘的委任令。



圖六　紅軍長征时吃过的野菜（上排自左至右为脚鸡苔、多实菜、水芹菜，下排自左至右为車前草，黄花菜、人參果）。

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12

1958

